

# 「策問」與科舉體制下對「西學」的接引 ——以《中外策問大觀》為中心\*

章 清\*\*

## 摘 要

「策問」在晚清科舉改革中成為關注焦點，自有其深意在，實際與對「西學」的接引聯繫在一起，並映射出世風之丕變，及思想學術的轉型。因為改制後的科舉，明確規定鄉會試之二場「試各國政治藝學策五道」，圍繞「各國政治藝學」所出「問策」，即體現了晚清各級官員思考世界事務的樞機所在，而參加科考的數十萬士子在「問策」導向下所作「應策」，更呈現出知識階層一般的思想狀況。本文即主要圍繞《中外策問大觀》及其他相關資料，檢討在科舉體制下對「西學」的接引情況。顯然，改試「策論」除為「西學」大開方便之門，也摧毀著中國傳統的知識架構。科舉歷經改革，不是什麼新問題，然「策問」地位之不斷提升，皆是為著糾正科舉考試之種種弊端。而廢除「八股」、改試「策論」一經落實，對於學術之轉向影響深遠。換言之，「策問」資料於晚清「西學」不僅是重要的「呈現物」，在知識的傳播及知識的「再生產」上，也另有一功。略為梳理「策問」與科舉改革之關聯，以及「策問」對接引西學知識所具有的媒介作用，對「策問」在晚清的特殊性或可有初步瞭解。

**關鍵詞：**策問、科舉、西學、中外策問大觀、經世文編

\* 本課題「中西學術交流：現代學科形成的視野」，由「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畫」資助。

收稿日期：2007年4月24日，通過刊登日期：2007年10月25日。

\*\*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研究員

光緒壬寅(1902)、癸卯(1903)與甲辰(1904)連續三年舉行的兩科鄉試與兩科會試，在中國科舉史上算得上特別的考試。不只因為這是科舉制度廢除前最後舉辦的考試，還在於考試內容廢除了八股文，改以「策論」為重點。研究科舉的論著對制度的變革多有解析，而對此一過程中產生的鄉會試試卷，及由此催生的供應試士子「揣摩」之用的「策問」資料，還較少關注。<sup>1</sup>「策問」在晚清科舉改革中成為關注焦點，自有其深意在，實際與對「西學」的接引聯繫在一起，並映射出世風之丕變，及思想學術的轉型。因為改制後的科舉，明確規定鄉會試之二場「試各國政治藝學策五道」，圍繞「各國政治藝學」所出「問策」，即體現了晚清各級官員思考世界事務的樞機所在，而參加科考的數十萬士子在「問策」導向下所作「應策」，更呈現出知識階層一般的思想狀況。

科舉考試作為一種程式化的考試，與之相伴隨的是各種為應試士子準備的可資效法的參考樣式。「策問」在晚清科舉改革中地位得以提升，也催生出各種彙編文字。這裡重點討論的《中外策問大觀》，其編輯出版，即應對著這樣的時勢。該書內頁署「元和陸鳳石先生鑒定」、「品三金汝霖題」，「光緒癸卯仲春硯耕山莊石印」。陸潤庠(1841-1915)為該書所寫序言，有如其之言：

今天子神聖英武，毅然舉積弊摧陷廓清之，壬寅秋下詔以中外史事政治策論試士，所以抉破錮弊，振起迂腐，毆使天下以成通今博古，閎中達外之才，盛哉。今日轉弱為強之一大關鍵也。夫吾神州以閉關自守為宗旨，學士大夫鮮通域外，庶幾即有好談外事者，巫〔誣〕謬誤傳，不啻如隔萬重霧障。三十年來，環球交通，聞見日廣，士亦以周知四國為榮，以不通曉外事為恥矣。然惟豪傑有志者始從事於此，百不得一二。<sup>2</sup>

<sup>1</sup> 關於研究科舉考試的論著不是這裡可以舉證的，值得說明的是，艾爾曼通過《光緒辛丑壬寅恩正併科會試闡墨》(1902)等資料，分析了改試策論後1902年舉辦的第一次考試，包括所出五道「各國政治藝學策」的具體內容及應策的情況。參見 Benjamin A.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p. 594-602.

<sup>2</sup> 陸鳳石，〈序〉，收入雷瑄編，《中外策問大觀》(硯耕山莊石印，1903)，頁1-2。

〈序〉中清楚交待，由於科考改以「中外史事政治策論試士」，士子紛紛爭購各種相關書籍，「不擇優劣真偽」，並「朝夕揣摩以期一得」。書賈見利忘義，「東抄西撮，刺取成篇，廣售牟利」。是書之編，即是編輯雷瑄(1871-1941)病於此，精心選編而成。並不諱言編輯此書，是為士子提供適應新的考試樣式的資料。還強調，苟取是編流覽，當開拓心胸，增濬智識，受益遠勝於訪問所出各書。<sup>3</sup>〈中外策問大觀·序〉未曾具體說明其資料來源，不過其刊登於《申報》等報刊的廣告，倒是言明其資料的主要來源，一是各省闈墨，一是新式學堂課藝（詳後）。這也點出此類資料另一值得重視的特點，均係彙集其他資料而成，所採集的對象，除各省闈墨，主要是晚清以來所出版的各種與「西學」、「經世」、「時務」密切相關的資料。因此，值得關注的不只是科舉改制後最後舉辦的四次考試留下的闈墨，還應重視在此前後編輯出版的供應試士子「揣摩」的資料。換言之，「策問」資料於晚清「西學」不僅是重要的「呈現物」，在知識的傳播及知識的「再生產」上，也另有一功。

本文即主要圍繞《中外策問大觀》及其他相關資料，檢討在科舉體制下對「西學」的接引情況。顯然，改試「策論」除為「西學」大開方便之門，也摧毀著中國傳統的知識架構。科學歷經改革，不是什麼新問題，然「策問」地位之不斷提升，皆是為著糾正科舉考試之種種弊端。而廢除「八股」、改試「策論」一經落實，對於學術之轉向影響深遠。略為梳理「策問」與科舉改革之關聯，以及「策問」對接引西學知識所具有的媒介作用，對「策問」在晚清的特殊性或可有初步瞭解。不過，儘管本文主要討論《中外策問大觀》所反映的西學，但於改試「策論」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自有必要略加說明；同時對那些年廣為刊刻的「策問」資料、「經世文編」及各種西學彙編資料，也需要加以梳

<sup>3</sup> 陸鳳石，〈序〉，收入《中外策問大觀》，頁 1-2。〈序〉中介紹雷瑄「曩在都門往還，頗洽時務」，後「主申報館筆政，益洞悉中外時事，且不惑莠言衰說」。有關雷瑄生平及著述的情況，可參見上海市松江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著，《松江縣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頁 1031。尚可補充的是，雷氏還編有《古今史論大觀》，前編 15 卷，後編 17 卷，光緒二十七年(1901)硯耕山莊石印。

理，以更好說明「策問」的「思想資源」，<sup>4</sup>並展現晚清「西學」傳播的方式。在此基礎上探討「策問」以什麼方式接引西學新知，也有相應的基礎。

## 一、科舉改革與「策問」

「策問」是一種特殊的文體形態，其原始形態是一種政務諮詢。按《說文》，策者，謀也。所謂「應詔而陳政」與「探事而獻說」，大體反映出這種文體的屬性所在。<sup>5</sup>如論者所言，「策問」是中國古代歷時最久、地位最穩固的考試文體；歷代選拔人才的考試，都離不開策問與對策。<sup>6</sup>其意主要在通經致用，而又須略具文采。<sup>7</sup>章學誠(1738-1801)〈清漳書院留別條訓〉對此論列甚詳，指明「策問」的特點主要體現在「問者引端不發，而對者按牘以陳」，並且「他文皆可誦習古人成法以為楷模，惟策則全取實學，斷非誦習成文、強記條目可以假借為之」：

策為揣摩之學，始於戰國，漢廷用為制舉之法。嗣是以來，風氣屢變，大約分別學問、經濟二途。經濟貴於引古證今，推陳指畫，要使卓然近於可用，不徒紙上空談已也。學問則經書子史，文采詞章，無所不用，問者引端不發，而對者按牘以陳，此正格也。他文皆可誦習古人成法以為楷模，惟策則全取實學，斷非誦習成文、強記條目可以假借為之。況時會不同，風趨亦異，自宋以前，經學用以闡發義理，史學

4 關於「思想資源」，可參見王汎森，〈戊戌前後思想資源的變化：以日本因素為例〉，《二十一世紀》，總第45輯(1998)，頁47-54。

5 劉勰〈文心雕龍·議對〉就將試策區分為「對策」與「射策」：「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獻說也。」同時也指出「二名雖殊」，但均係「議之別體」。見周振甫註，《文心雕龍注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頁266。

6 參見吳承學，〈策問與對策〉，收入氏著，《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第2章，頁44-63。

7 大致說來，中國古代選學考試的主要內容不外乎經學（家法、帖經墨義、經疑、經義）與文學（詩賦）。策問及誥、論、表等公牘則可以說是兩者的結合，或更偏重於經學，其意主要在通經致用，而又須略具文采。參見何懷宏，〈選舉社會及其終結——秦漢至晚清歷史的一種社會學闡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頁167。

用以敷陳治道，應舉之士，得一己之見，自為推論，初無一定之格有所限制者也。元、明以來，試士專重《四書》文義，策對經旨，俱守學校成說，史事空作議論，亦多依傍宋儒之言，其道猶未盡善。本朝經學光昌，政典修舉，依古以來，未有如斯之盛。鄉會二試，所為發策決科，皆是試覘士子記誦而已，本無缺事失理，有待於士子之敷陳也。且對義若無依據，皆可自恣其說。<sup>8</sup>

可以說，「策問」乃科學考試中流傳已久的一種體裁，湯震(1857-1913)《危言》就大致勾畫了其中轉變的脈絡：「變舉選而為門望，變門望而為科目，科目之中，策問詩賦八股又遞變焉。」<sup>9</sup>在清末科學改制前，即嘗試提升「策問」的地位，以糾正科學考試所延伸之種種弊端。<sup>10</sup>其具體的書寫樣式，也有一定程式。編纂於1820年代的《皇朝經世文編》收錄有幾則「殿試對策」，僅就外觀言，「對策」之形態就頗引人矚目。均以「臣對」開篇，文中會反饋「制策」之具體內容，末尾則接「臣草茅新進，罔知忌諱，干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sup>11</sup>曾投身科學的末科探花商衍鎤(1874-1963)對此作了更詳細說明，他取每場闡作之四書、五經義及論、策各一篇，以見八股文外考試題文之一斑。由於殿試對策，其制不同，所以他又特選二篇，並載發問策題及應試者之履歷，以見體裁。其中所舉策例，乃光緒三十年(1904)甲辰科會試中式第一名譚延闓第二場各國政治策闡作一篇——「泰西外交政策往往藉保全

<sup>8</sup> 此文收入《章學誠遺書佚篇》(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此據陳谷嘉、鄧洪波主編，《中國書院史資料》(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中冊，頁1902-1923，引文見頁1921-1922。

<sup>9</sup> 湯震，《危言》(光緒十六年[1890]石印本)，卷1，頁12。

<sup>10</sup> 康熙二年禮部即曾遵旨議覆，「鄉會考試，停止八股文，改用策、論、表、判。鄉會兩試，頭場策五篇，二場用四書本經題作論各一篇，表一篇，判五道，以甲辰科為始。」見《聖祖仁皇帝實錄》，卷9，康熙二年八月條下，收入《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冊4，頁154。只是清初之廢八股改試策、論、表、判，只行於甲辰、丁未二科(康熙三年、六年)，到康熙七年，又恢復舊制，鄉會試仍以八股文取士。參見王德昭，《清代科學制度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161-162。

<sup>11</sup> 這些對策的作者分別是馬世俊、繆彤、儲方慶，見賀長麟輯，《皇朝經世文編》，卷7，「治體一」，收入日本近代中國研究委員會編，《清朝經世文編總目錄》(台北：文海出版公司影印本，無出版年月)，冊1，頁302-313。

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實。蓋縷舉近百年來歷史以證明其事策」。照商之看法，「未廢八股時，鄉會試第三場之策，是條對性質，舉經史政事以爲問題，隨問而條答之，不寫題目，只寫第一二問等，此改爲各國政治藝學策，須照寫策題，而策文對答寬泛，略類於論體矣。」<sup>12</sup>應該說，較之於「四書文」、「五經義」之類的文字體裁，「策問」還算是能許士子「自盡所長」的文字，張之洞(1837-1909)於 1875 年爲渴望進學之士所作《輜軒語》，曾言及「對策談何易易？」不過，「平日見書多者，學問有門徑者，自能多有所知，不至瞠目茫然。」總之，「經文或可欺門外漢，對策除平日多讀書外，別無捷徑。」<sup>13</sup>康有爲(1858-1927)1896 年在萬木草堂講學時，也這樣向學子介紹應策經驗，「策學以《史通》合裁，問僻典以對爲貴。能旁對爲上乘，對出問外也。問時務子書，以議論爲主。」<sup>14</sup>陳獨秀(1879-1942)早年投身科考，對八股文也是格格不入，但自認「經義」和「策問」，是其「覺得有點興趣的」，令人討厭的是所謂的「館閣體」。<sup>15</sup>

「策問」之所以值得提出來加以檢討，乃是因爲其在晚清科學變革中成爲焦點所在。甚至可以說，「策問」之被重視及其所闡述的具體內容，實際成爲晚清「自改革」的象徵。因爲改試「策論」仍是在科學的架構下圖謀變革，是在眾多改革主張中選擇的較爲保守的方案，其結果也不過是將科學的命運再延續幾年。重要的是，內中體現出晚清改革的方向，並映射出「西學」新知是如何被接納的。

換言之，「策論」是晚清圍繞科學之「存廢」而走出的變通方案。對「八

<sup>12</sup> 這裡所說的「論體」，指的是論體大致分三段：第一段總發題旨，第二段實作全題，第三段推開說，挽回本題以作收束。見商衍鎰，《清代科學考試述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8），頁 265-287。

<sup>13</sup> 張之洞，《輜軒語》，收入陳居淵編，朱維錚校，《書目答問二種》（香港：三聯書店，1998），頁 323。

<sup>14</sup> 康有爲，《萬木草堂口說》（1896），此爲康在萬木草堂講課時學生所記筆記。見姜義華、吳根樑編校，《康有爲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 2 集，頁 253-432，引文見頁 400。康有爲在 1895 年 5 月 22 日曾應殿試，其《殿試策》對此有所反映。同上書，頁 127-131。

<sup>15</sup> 陳獨秀到南京參加江南鄉試的時間是 1897 年，科學考試尚未改試「策論」。陳獨秀，《實庵自傳》，收入林茂生等編，《陳獨秀文章選編》（北京：三聯書店，1984），下冊，頁 559。

股取士」之檢討代不乏人，論者對此多有闡述，此不贅。<sup>16</sup>這裡需要略加說明的是將廢除八股與講求實學、乃至西學聯繫在一起的主張。王韜(1828-1897)1891年發表於《萬國公報》的一篇文章，即闡明「今之所謂士者，皆有士之名，而無士之實者也。」具體表現在「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長，問以錢穀不知，問以兵刑不知，出門茫然，一舉步即不識南北東西之向背哉？」故此，「時文不廢，人才不生；必去時文尚實學，乃足以見天下之真才。」<sup>17</sup>嚴復(1854-1921)則將「廢八股」與「大講西學」聯繫在一起。甲午之戰，嚴復所受刺激甚巨，不由慨歎，「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學問之非，與士大夫心術之壞。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管、葛復生，亦無能為也。」<sup>18</sup>他在〈救亡決論〉一文中，開宗明義就提出當務之急是「廢八股」：「天下理之最明而勢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國不變法則必亡是已。然則變將何先？曰：莫亟於廢八股。」  
「夫科舉之事，為國求才也，勸人為學也。求才為學二者，皆必以有用為宗。而有用之效，征之富強；富強之基，本諸格致。不本格致，將無所往而不荒虛。」八股取士正是「使天下消磨歲月於無用之地，墮壞志節於冥昧之中，長人虛驕，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輔國家，下不足以資事畜。」<sup>19</sup>

在刊於《時務報》的文章中，梁啟超(1873-1929)則明確提出變革科舉之上中下「三策」。所謂「上策」，乃「遠法三代，近采泰西，合科學於學校」。而「中策」，「則莫如用漢唐之法，多設諸科，與今日帖括一科並行」。至於「下策」，便是「一仍今日取士之法，而略變其取士之具」。梁的理想目標是「合科學於學校」，即所謂的「由上策者強，由中策者安，由下策者存。」<sup>20</sup>

<sup>16</sup> 除前述喬衍鎰、王德昭及艾爾曼的著作，尤值一提的是 Wolfgang Franke, *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sup>17</sup> 王韜，〈原士〉，《萬國公報》，冊 25，1891 年 2 月。又見王韜著，李天綱編校，《弢園文新編》（香港：三聯書店，1998），頁 10-12。

<sup>18</sup> 嚴復，〈與長子嚴璩書〉，收入王栻主編，《嚴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冊 3，頁 780。

<sup>19</sup> 嚴復，〈救亡決論〉，收入《嚴復集》，冊 1，頁 40-54。

<sup>20</sup> 梁啟超，〈變法通議 論科舉〉，原刊《時務報》，冊 7、8，1896 年 10 月 7、17 日。又見《飲冰室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影印本），文集之一，頁 27-29。同樣痛斥科舉並主張改書院為學校者，在晚清可謂大有人在。宋恕(1862-1910)1897 年刊印的〈六字課齋卑議〉就指出書院課題當改分「性理、古事理、今事理、物理四科；性理題出諸孔、孟、老、莊及印度、

康有為則將目光聚焦於「文體」，試圖以此作為突破：「制藝之科，行之已數百年，沿襲至今，適承其敝，若不思變計，固無以得人才，若驟更成法，亦復猝無善策。嘗統籌利弊，熟計重輕，以為非立法不善之為害，而實文體不正之為害也。故欲求真才，必自釐訂文體始。」<sup>21</sup>稍後不久，則逐漸明晰了廢除「八股」、改試「策論」的主張，「變法之道萬千，而莫急於得人才；得才之道多端，而莫先於改科舉。今學校未成，科舉之法，未能驟廢，則莫先於廢棄八股矣。」康將改試策論作為改革科舉重要的中間環節，即是看重「策問」之體，「能通古證今，會文切理，本經原史，明中通外，猶可救空疏之宿弊，專有用之問學。」<sup>22</sup>在代宋魯伯所擬〈請改八股為策論摺〉中，康更明確表達了這方面的意思，「夫西人之於民，皆思教之而得其用，故自童幼至冠，教之以算數圖史，天文地理，化光電重，內政外交之學，惟恐其民之不智；而吾之教民，自卯角以至壯歲，束縛於八股帖括之中，若惟恐其民之不愚也者，是與自縛到戈，何以異哉？」<sup>23</sup>不難看出，科舉改革凸顯「策問」之作用，實際與對西學的连接聯繫在一起。

事實上，科舉改革勢在必行，最基本的也是受到「西學」的衝擊。西學內容進入科舉考試始於「算學科」的開設，「經濟特科」的舉辦更使西學內容廣泛納入科舉考試中，涉及內政、外交、理財、經武、格致、考工等內容。<sup>24</sup>既

---

波斯、希臘、猶太諸先覺師徒經論；古事理題出諸內外史傳；今事理題出諸現行律例、現上章奏及外國現行律例，年、季、旬、日各新聞紙；物理題出諸新譯歐美人所著各種物理書。四科輪課，文任駢散；無論何人，均許應課。」見胡珠生編，《宋恕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上冊，頁134。

<sup>21</sup> 此文乃康有為1898年6月1日代楊深秀擬就的〈請釐定文體摺〉，見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上冊，頁247-249。

<sup>22</sup> 康有為〈請廢八股試帖楷法試士改用策論摺〉所指出八股之弊端，主要即在吸納新知上全無辦法，「立法過嚴，以為代聖立言，體裁宜正，不能旁稱諸子而雜其說，不能述引後世而謬其時，故非三代之書不得讀，非諸經之說不得覽，於是漢後群書，禁不得用，乃至先秦諸子，戒不得觀。其博學方聞之士，文章爾雅，援引今故，間徵子緯，旁及異域，則以為犯功令而黜落之。」見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冊，頁268-271。

<sup>23</sup> 康有為，〈請改八股為策論摺〉（代宋魯伯擬，1898年6月17日），收入《康有為政論集》，上冊，頁264。

<sup>24</sup> 有關奏章及論旨，可參見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四）》（北京：中華書局，1958），頁4025-4026。研究者即闡明，清季從改科考到廢科舉，取士標準有一個變化的過程。廢科舉前的

如此，自當關注來華西人針對中國教育展開的論說。以發表於《萬國公報》的文字來看，來華西人更明確主張以振興學校、補充各學科的知識作為科學改革的方向。狄考文(Calvin W. Mateer, 1836-1908)〈振興學校論〉就提出，學問之要在能「增人所知之事，廣人所明之理」，「若館中所讀之書，所用之功，只能聞人之心才，不能增人之智慧，即未盡其為學之用，如是之學只屬乎虛而不得稱為實學。所謂實學者在周知天下之事，而遍格萬物之理也。」文章還具體談到，諸如格物、化學、天文、數學等「文學大端」，「何弗列於學堂之功課與文章並考，俾致知之實學得速行於中華哉？」<sup>25</sup>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1882年撰寫的〈中國專尚學業論〉也指出「上古士少而登用之路寬，後世士多而入仕之途仄」。今日所謂「士」，「不獨通顯無期，亦且謀生乏術」，原因正在於「天下智能才藝之士一一束縛於學業、制業、試律之中，而不知變計之為」。故此，今日之中國，縱不能舉學業之制義試律而廢之，亦當如有唐秀才、明經、俊士、進士、明法、明字、明算，「多其科目」，或參以宋司馬溫公所云，取法「十科取士之制而斟酌行之」。更當如泰西之法，分設天文、地輿、格致、農政、船政、理學、法學、化學、武學、醫學，「如是數年而國家不收有腹心干城好仇之助者，無是理也。」<sup>26</sup>

而「策問」構成接引西學新知之重要媒介，也並非僅由科學改革顯示出來。阮元(1764-1849)〈學海堂策問〉為學子所列參考問題，即傳遞著西方新知。<sup>27</sup>晚清格致書院課藝，更反映出「策問」體裁作為課考內容的延伸。上海格致書院由英國駐滬領事麥華陀(Watler H. Medhurst, 1823-1885)倡議創辦，而不少中

---

十餘年間，取士標準已是鼓勵新舊學兼通。見羅志田，〈清季科舉制改革的社會影響〉，《中國社會科學》，1998年第4期，頁185-196。

<sup>25</sup> 狄考文，〈振興學校論〉，《萬國公報》，卷653-656，光緒七年閏七月初三日至閏七月二十四日（1881年8月27日至9月17日），此據李天綱編校，《萬國公報文選》（香港：三聯書店，1998），頁234-248。

<sup>26</sup> 林樂知，〈中國專尚學業論〉，《萬國公報》，卷704，光緒八年七月二十日（1882年9月2日），收入《萬國公報文選》，頁249-251。

<sup>27</sup> 阮元，〈學海堂策問〉，見《研經室續集》，卷3，文選樓原刻本，此據陳谷嘉、鄧洪波前引書，《中國書院史資料》，中冊，頁1935-1936。

國士紳也與議其事，主要由王韜、傅蘭雅(John Fryer, 1839-1928)主持院務。格致書院的特出之處在於講求科學知識，課藝主要環繞科學與時事。王韜曾將歷次課藝題目、命題人姓名、部份優秀答卷，以及評閱人的評語、眉批，逐年彙集印行，分爲十五冊。<sup>28</sup>並指明之所以彙集課藝，正是爲著「留意格致文字者，得以覽觀焉。」<sup>29</sup>尚可注意的是廣學會舉辦的各種有獎徵文。廣學會前身是 1887 年在上海成立的「同文書會」(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a)，1894 年改稱「廣學會」(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總結「廣學會」的成績時，就表示，「會中命意之所在，務欲推廣西國之學於中國。」中國的問題乃「苦於不知五洲萬國之事，而未究其學耳」，「廣學會」之設，正是爲著「遍采泰西有裨於國計民生之學，著爲論說，勒爲成書」，「華人之見之者，如以爲先路之導，頂門之鍼也，則不徒敝會之幸也。」<sup>30</sup>爲推廣西學，廣學會曾多次主辦有獎徵文，1894 年就在蘇州、北京、廣州、福州、杭州五個城市散發了一萬張徵文通知，李提摩太所出五道問題，也主要涉及時務，類似於格致書院課藝。<sup>31</sup>

正是在諸多因素的推動下，<sup>32</sup>1898 年 6 月 23 日，光緒帝(1871-1908)下詔：「著自下科爲始，鄉、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向用四書文者，一律改試策論。」還具體指陳，「時文積弊太深，不得不改絃更張，以破拘墟之習。至士

<sup>28</sup> 格致書院季課始於 1886 年，止於 1894 年，一年四次。特課始於 1889 年，止於 1893 年。課藝命題，有時一次一題，有時一次多題，多至四題、五題。九年間，計有 18 人參加命題（90%以上關涉西學與時務），考課 46 次，凡 88 題。獲得超等、特等、一等的共有 1,878 人次，來自全國十多個省區。參見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頁 362-91。

<sup>29</sup> 王韜，〈丙戌格致書院課藝序言〉，見收入氏著，《格致書院課藝》（上海：上海圖書集成印書局印，光緒二十四年[1898]），頁 1。

<sup>30</sup> 李提摩太述，鑄鐵齋主譯，〈廣學會第六年紀略〉，《萬國公報》，冊 60，光緒十九年十二月（1894 年 1 月），《萬國公報文選》，頁 275。

<sup>31</sup> 五道問題分別是：1. 開築鐵路、鼓足銀錢、整頓郵政爲振興中國之大綱論；2. 維持絲茶議；3. 江海新關考；4. 禁煙檄；5. 中西敦睦策。詳情可參見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頁 556-559。

<sup>32</sup> 關於科舉改革涉及的面向甚多，論者對這一決策的過程進行了深入探究，指出圍繞這一重大決策，統治集團內部主張變革的督撫大員乃至樞要重臣，曾進行長期而頻繁的聯絡及活動。見關曉紅，〈科舉停廢與清末政情〉，《中國社會科學》，2004 年第 3 期，頁 194-204。

子為學，自當以四子六經為根柢。策論與制義殊流同源，仍不外通經史以達時務，總期體用兼備，人皆勉為通儒。」<sup>33</sup>儘管只是圍繞科舉之「存廢」走出的變通方案，然廢除「八股」、改試「策論」一經落實，對於學術之轉向，影響深遠。《知新報》該年年底刊發的一篇文章，就表示：「科舉，法之善者也，然合科舉於學校則是，離科舉於學校則非。」文章舉證西人培育人才之法，指出：「以西人學校取士之法而論，則科舉在所必廢，而後始可以得真才。」同時強調今之改試策論，「朝廷已無可如何，為一孔之儒謀衣食，因而遷就之者也。」<sup>34</sup>梁啟超對此也表示，「以科舉取士，必不能得人才也，故不惟八股當廢，即科舉亦當全廢，而一切學級，悉自學校出，此乃正理也。然此次不即爾者，蓋使數百萬之老舉人老秀才，一旦盡失其登進之路，恐未免傷於急激，且學校生徒之成就，亦當期之於數年以後。」為此他也坦誠，「此數年中借策論科舉為引渡，此亦不得已之辦法也。」<sup>35</sup>對此，各方輿論也有積極回應，《申報》在上諭刊布未幾日，就發表文章對比「策論」與「八股」指出，「以文質而論，八股文而策論質；以虛實而論，八股即實而仍虛，策論雖虛而實實。八股略解四子經書，即能葫蘆依樣；而策論苟非略知經史，稍有見地，不能從事。粗言之，八股似難而實易；精言之，策論似易而實難。救今之弊，挽今之習，舍質與實，無他法也，豈非盛衰強弱之一大轉機乎？」<sup>36</sup>張之洞、劉坤一(1830-1902)對此的分析算得上切中肯綮：為人才計，自宜多設學堂，分門講求實學，「惟數年之內，各省學堂不能多設，而人才不能一日不用，即使學堂大興，而舊生員年歲已長，資性較鈍不能入學堂者，亦必須為之籌一出路。」而「漸改科舉之章程以待學堂之成就」，便是不二之選，「似此辦法，策論乃諸

<sup>33</sup> 《德宗景皇帝實錄》，卷 419，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丁巳（初五日）（1898 年 6 月 23 日），諭內閣，見《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冊 57，頁 491。

<sup>34</sup> 〈論中國變政並無過激論〉，《知新報》，冊 74，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一日（1898 年 12 月 13 日），此據澳門基金會、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6 年所出版之影印本，下冊，頁 1027。

<sup>35</sup>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收入氏著，《飲冰室合集》（上海：中華書局，1936），專集冊 1，頁 34-35。

<sup>36</sup> 〈恭讀五月初五日上諭謹註〉，《申報》，光緒廿四年五月十二日（1898 年 6 月 30 日）。

生所能，史學、政治、時務乃三場策題所有。考生斷不致因改章而擱筆，科場更可因改章而省費，而去取漸精，學業漸實，所得人才固已較勝於前矣。」<sup>37</sup>

問題還不只是考試內容上的變革，考試次第的變化，也值得一說。關鍵在於，儘管清廷屢有諭旨，命令各省學政嚴飭教官，於季考、月課時加試策論，但通觀有清一代，科舉考試之但重首場，而首場尤重四書文如故。<sup>38</sup>陳澧(1810-1882)〈科場議〉對此有所評估，「今之科場，士子多者至萬餘人，人各為十四藝，試官不能盡閱也。於是三場專重第一場，視二場三場無足輕重，甚至有不閱者。故士皆專力於四書文，而成荒經蔑古之風也。」<sup>39</sup>既如此，科舉考試中次第的改變，也值得當做重要一環加以審視。張之洞就明確提出，「若一切考試節目，未能詳酌妥善，則恐未必能遽收實效，而流弊亦不可不防。」其檢討八股文之流弊，就較為重視考試「次第」上存在的問題：

雖設有二場經文，三場策問，而主司簡率自便，惟重頭場時文，二三場字句無疵，即已中式，遂有三場實止一場之弊。今改用策論，誠足以破拘攣陳腐之習矣。然文章之體不正，命題之例不嚴，則國家垂教之旨不顯，取士之格不一，多士之趨向不定。<sup>40</sup>

這些看法，確可看作改試「策論」須面對的問題。或許不該質疑張之洞關注「聖教興廢」之誠意，然正如其「中體西用」主張的詭異性，看起來似乎是一個保守的方案，所圖謀的主要還是「西用」。此摺也是試圖「籌一體用一貫之法」，認為「求才不厭其多門，而學術仍歸於一是，方為中正而無弊」。問題正在於，這個精心規劃的考試安排，恰足以產生這樣的結果。<sup>41</sup>儘管張之洞

<sup>37</sup> 〈光緒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張之洞、劉坤一變通政治人才為先遵旨籌議摺——酌改文科〉，見朱有瓚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第1輯，下冊，頁120-122。

<sup>38</sup> 參見王德昭，《清代科舉制度研究》，頁164-66。

<sup>39</sup> 陳澧，〈科場議〉三，見盛康編，《皇朝經世文續編》（思刊樓刊板，光緒二十三年[1897]），「禮政六貢舉」，卷66。

<sup>40</sup> 張之洞，〈妥議科舉新章摺〉（與陳寶箴會銜所上），收入中國史學會編，《戊戌變法》（上海：神州國光社，1953），冊2，頁467。

<sup>41</sup> 張之洞，〈妥議科舉新章摺〉（與陳寶箴會銜所上），收入中國史學會編，《戊戌變法》，冊2，頁466-471。需要說明的是，撰寫《勸學篇》時，張即闡述了對改革科舉系統的意見，所擬

多方辯護，試圖對聖教的內容有周到安排，甚至表明此有裨於四書五經之重，但這樣的次第安排，適足以影響四書五經等內容的彰顯，其實際效果也將為接引西方知識產生重要影響。1898年7月8日，光緒帝再次下詔，就大致接受了張之洞變革科學的方案。<sup>42</sup>如所周知，戊戌時期所頒發的各項舉措，大多未曾落實，政變後，一切概行停罷，恢復舊制，科考也不例外。但所謂大江東流擋不住，至辛丑年七月十六日（1901年8月28日），上諭又重申了戊戌時之意見：

著自明年為始，嗣後鄉、會試頭場，試中國政治史事論五篇，二場試各國政治藝學策五道，三場試四書義二篇、五經義一篇。考官閱卷，合校三場以定去取，不得偏重一場。生童歲、科兩考，仍先試經古一場，專試中國政治史事及各國政治藝學策論，正場試四書義、五經義各一篇。考試試差、庶起士散館，均用論一篇、策一道。進士朝考論疏、殿試策問，均以中國政治史事及各國政治藝學命題。以上一切考試，凡四書、五經義，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論均應切實敷陳，不得仍前空衍剽竊。<sup>43</sup>

大致說來，科學改革本有接引新式知識的意圖，康有為將此分出兩步走，先以策論代替經義，後以學校代替科考，或許是這一意圖最直接的表現。張之洞所落實的辦法，意圖雖未明確闡明，卻也達至同樣結果。相應地，落實這一意圖的重要媒介「策問」，便也成為晚清中國接引西學知識的重要途徑。梁啟超後來對此的總結，就指明八股取士導致新知之難以接納，「尊其體曰代孔孟立言，嚴其格曰清真雅正」，其結果是「士人皆束書不觀，爭事帖括，至有通

---

定辦法，即是分三場考試，分別測試考生之「中學經濟」、「西學經濟」與「四書五經文」。張之洞，〈勸學篇外篇·變科學第八〉，收入氏著，《勸學篇》（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9輯。

42 朱壽朋，〈光緒朝東華錄（四）〉，頁4141。

43 《德宗景皇帝實錄》，卷485，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己卯（1901年8月29），見《清實錄》，冊58，頁412。如王德昭強調的，「其詔文用語，與戊戌年的罷時文之詔，幾如出一轍。」見王德昭，《清代科學制度研究》，頁235-236。

籍高第，而不知漢祖唐宗爲何物者，更無論地球各國矣」。廢除八股後產生的實際效果，即是爲接引新式知識廣開門扉。是否如梁所言「海內有志之士，讀詔書皆酌酒相慶，以爲去千年愚民之弊，爲維新第一大事也」，還不好說，面臨如此之驟變，士子不免會惶恐不安。但他所說的另一種情形，倒值得重視，「八股既廢，數月以來，天下移風，數千萬之士人，皆不得不舍其兔園冊子帖括講章，而爭講萬國之故，及各種新學，爭閱地圖，爭講譯出之西書。」<sup>44</sup>梁清楚點出了科舉改革所具有的導向作用，「策問」正是接引「西學」新知的重要仲介。

## 二、「策問」：對新式知識的接引

「科舉改弦，譯纂方始，南北各局執筆之士甚多。分以銷售利益，庶有以泯其作嫁爲他之塞責，而動以洛陽紙貴之可欣求，達難顯之情，期讀者之皆喻；則此學不獨使譯家風氣日上，而求所譯之有用與治彼學者之日多，皆可於此寓其微權。」<sup>45</sup>嚴復致張元濟(1867-1959)此封信函，言及科舉改制後對譯書業的推動。《中外日報》一則「論說」也闡述了「譯書亟宜推廣」的主張，原因正在於，「蓋八股既廢而科舉不停，策問所及，必爲時務。時務不能空言，彼發策之人與對策之人，均必有所取材之地。此取材之地無過讀譯本書耳。」換言之，「國家既存科舉，則廣辦譯書一事刻不容緩矣。」<sup>46</sup>

「改試策論」不僅影響於譯書、出版業，更使士子受到極大衝擊。關鍵在於此舉提供了明確信息，科舉考試的內容將集中於測試士子對時務的把握，對西學新知的掌握。禮部與政務處會奏「變通科舉事宜摺」就提出，「今既一律考試論策義，是准今仍以酌古，天下學術所在，即國家治本所賅，關係實非淺鮮。」尤其是「科舉節目，頭緒紛繁」，又有必要對考試具體事宜列出具體之

<sup>44</sup> 梁啓超，〈戊戌政變記〉，收入《飲冰室合集》，專集冊1，頁25-26。

<sup>45</sup> 嚴復，〈與張元濟書〉，收入《嚴復集》，冊3，頁544。

<sup>46</sup> 〈論譯書亟宜推廣〉，《中外日報》，1903年8月30日，第1版。

章程，「分別咨行京外各衙門一體遵照」。針對第二場試各國政治藝學策五道，所呈〈章程〉就指出：「查各國政治，自以學校、財賦、商務、兵制、公法、刑律、天文、地理為大綱。其藝學則格致、算術、製造、聲、光、化、電等類，亦宜研究入微，各求心得。現奉新章以此命題試策，士子講求時務肄習有素者，自可各抒底蘊。惟恐邊遠省分，風氣尚未大開，現譯各書亦未流傳悉遍。擬請近科考試，先以各國政治藝學中之切於實用者命題。」不僅指明考試的具體內容，〈章程〉對於闈中備考書籍，也有所說明：

闈中備考書籍，均係欽頒，間有調閱隨時坊間購置；禮部向存書序，卷帙紛繁，兵燹之餘，全行散失。現又改試策論，講求中國政治史事及各國政治藝學，所需書籍尤多。查同治年間江南、浙江、湖北、廣東等省，曾將各種書籍設局刊板，流傳已久。所有場中備用各書，擬由禮部開單咨取，江南、浙江、湖北、廣東各省官書局照單咨送。至應用各國政治藝學諸書，亦擬由兩江、兩廣、兩湖各督撫查照現已譯成之書，有關鄉會試闈中備查者擇要開單，一併咨送到部。其學堂所有書籍，亦許闈中隨時調閱。<sup>47</sup>

這番話甚值注意，科學改制後，連主考官對於備考書籍都要多方設法獲取，「今以不習天文、地輿、兵法、算學之主司，而使之主天文、地輿、兵法、算學之文，衡試必以絢爛奇異者為工，而所取非浮誇誕妄之人，必剿襲剽竊之輩，求真才而愈不可得。」<sup>48</sup>這是擔心主考官能否勝任，應試之士子更是難以適應這一轉變。

姚公鶴《上海閒話》描繪了科學改制後引起的種種異動，「當戊戌四五月間，朝旨廢八股改試經義策論，士子多自濯〔琢〕磨，雖在窮鄉僻壤，亦訂結數人合閱滬報一分。而所謂時務策論，主試者以報紙為藍本，而命題不外乎是。

<sup>47</sup> 〈禮部政務處會奏變通科學事宜摺〉（附章程），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一日（1901年12月11日），見朱有瓚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1輯，下冊，頁130-134。

<sup>48</sup> 〈光緒二十七年(1901)於蔭霖遵旨敬抒管見摺〉，見朱有瓚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1輯，下冊，頁128-129。

應試者以報紙爲兔園冊子，而服習不外乎是。書賈坊刻，亦間就各報分類摘抄，刊售以侷利。蓋巨剪之業，在今日用之辦報以與名山分席者，而在昔日則名山事業且無過於剪報學問也。」<sup>49</sup>包天笑(1879-1973)《釧影樓回憶錄》則講述了遭逢中日甲午之戰的青年人所產生的種種變化。向來莫談國事的讀書人，受到震動，也要與聞時事，思考讀書人除了八股八韻之外，是不是還有其他應該研究的學問。於是「常常去購買上海報來閱讀，雖然只是零零碎碎，因此也略識時事，發爲議論，自命新派。也知道外國有許多科學，如什麼聲、光、化、電之學，在中國書上叫做『格物』。一知半解，咫聞尺見。」<sup>50</sup>「改試策論」對於讀書人的影響，在朱峙三(1886-1967)日記中也有清楚呈現。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辛丑日記就記有：「朝廷近日已下詔改科學制度，不用八股詩賦取士，師命以後每夕讀《古文觀止》。」教學安排中很快也在進行調整，正課題便分別改爲「中西互市，利源外溢，將何法整頓商務，挽回利權議」和「鐵路一舉，於中國大局有何關礙，試確切論之。」其師可歸於識時務者，「此時務題也，師喜看新書，講求時務之學。城內教書者，無不樂與談論，領其塵教也。」<sup>51</sup>也有難以適應這種變化的，山西士紳劉大鵬(1857-1942)對此就不無憂慮，「國家取士以通洋務、西學者爲超特之科，而孔孟之學不聞鄭重焉。凡有通洋務、曉西學之人，即破格擢用，天下之士莫不舍孔孟，而向洋學，士風日下，伊於胡底耶？」甚至不無抱怨，「時人之所務（如洋務等類），是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者也，其不入於歧途者鮮矣。嗟乎，正學不明遂至務爲新奇，以亂正學，天下所以晦盲否塞者職此故耳。」<sup>52</sup>

<sup>49</sup> 姚公鶴，《上海閒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頁132-133。

<sup>50</sup> 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頁169。

<sup>51</sup> 〈朱峙三日記（連載之一）〉，收入中南地區辛亥革命史研究會、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編，《辛亥革命史叢刊》（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第10輯，頁324、326。

<sup>52</sup> 劉大鵬遺著，喬志強標註，《退想齋日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初五（1901年10月16日），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初二（1902年2月9日），頁102、105。關於劉大鵬，詳見羅志田，〈科學制的廢除與四民社會的解體——一個內地鄉紳眼中的近代社會變遷〉，收入氏著，《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頁161-190；又可參看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爲之寫的傳記，*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 One Man'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1857-194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無論贊同與否，準備繼續參加科考的士子都將受改試策論的影響，必須瞭解策論之格式體裁，以及可以取法之範文。朱峙三記錄了 1902 年的情形，「武漢又有販各省闈墨到縣來賣者，策論格式體裁如此。予初離八股，學論義，現知取法矣。」<sup>53</sup>他也頗為留心各省闈墨，「熟讀而深思之」。所讀主要是壬寅、癸卯之闈墨，「連日讀癸卯科各省闈墨，係今年上海書局石印者，首題大學堂選。惜字太小，費目力耳。」<sup>54</sup>不獨於此，還設法獲取新書，以應對撰文之需。日記中留下這樣一些紀錄，「下午由袁夏生借到鄭赤帆所購時務新書，如《中國魂》、《新民叢報》之類，精神為快，可以開文派又一格矣。」選擇這些資料，原因正在於，讀《新民叢報》、《中國魂》之類，「習其文體，是為科舉利器。今科各省中學卷，多仿此文體者。」<sup>55</sup>朱所借閱的書還包括《瀛寰志略》等新地理書，並購買了《時務通考》一部，「《時務通考》閱竣三分之二，略知外國情況。」<sup>56</sup>這裡透露出，改試策論後，應試考生自覺搜尋相關西學書籍。

朱峙三日記中記載的只是士子之個案，未曾提及各種「策問」彙編資料。實際上，科舉「改試策論」催生出大量的出版物。關鍵在於，科舉改試策論增加了應試士子之壓力，相應地為這類書籍的出版提供了機會。《中外日報》一篇文章對此的分析頗為中肯，值得在此徵引。文章指出了科舉更張之意非不善也，「然其弊實亦甚多」：

一在求之太備。既欲其通知本國古今政治及史事，又欲其通知各國政治藝術各專門之學，又欲其通知四書五經大義，夫此數者，在昔人專精一門已屬不易，今乃欲其無所不通，儲之於平日，以待試官之發問，天下果有其人耶？一在責之太驟。科舉改章之事，自降旨通行後，至今

---

Press, 2005)；關曉紅則以劉大鵬、朱峙三日記為視角，考察了科舉停廢對士子命運與鄉村社會的實際影響，見〈科舉停廢與近代鄉村士子——以劉大鵬、朱峙三日記為視角的比較考察〉，《歷史研究》，2005年第2期，頁84-99。

<sup>53</sup> 〈朱峙三日記（連載之一）〉，收入《辛亥革命史叢刊》，第10輯，頁335。

<sup>54</sup> 〈朱峙三日記（連載之二）〉，收入中南地區辛亥革命史研究會、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編，《辛亥革命史叢刊》（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第11輯，頁285-288、340。

<sup>55</sup> 〈朱峙三日記（連載之一）〉，收入《辛亥革命史叢刊》，第10輯，頁335-337。

<sup>56</sup> 〈朱峙三日記（連載之二）〉，收入《辛亥革命史叢刊》，第11輯，頁298-299、306。

不滿一年。當未改章之前，其留心中外古今時務者，誠不乏其人，然欲使一省之中應試之士子，皆足副其選，則固難言之矣。今期以極備之學，有責以極促之限，此即有絕人之姿稟，有一目十行之精力，一覽不忘之記性，尚恐其不能將各書讀盡，況其下焉者乎？職是之故，士子既無此精力，又無此閒暇，則自不得不廣購各書以供場中之襲取。是則考試所得之人材，直剽竊而已矣。謂可得真材實學，誰其信之夫。<sup>57</sup>

這裡說得很清楚，改試策論後，在短短時間裡，應試士子既要周知本國古今政治及史事，還要瞭解各國政治藝學，且四書五經大義還不得丟開，可謂不可能的任務，於是「不得不廣購各書以供場中之襲取」，由是，各種「策問」資料也應運而生。這裏不妨對晚清出版的部份「策問」資料，略加說明。

《策學備纂》、《策府統宗》與《策論舉偶》等書籍，所顯示的是科舉改制前的情形。光緒十四年(1888)上海點石齋所印《策學備纂》，其序曰：「著述之體，勢難兩兼。詳於理亂興廢之跡，則略於典章經制之數；勤於文獻掌故之收，則疏於義律論議之體。」還清楚交待了類目安排之原則，與「經世文編」之編可謂異曲同工（詳後）。<sup>58</sup>相比於《策學備纂》，《策府統宗》更可以作為審視問題的起點。1902年《中外日報》登載的一篇文章，就稱此書為科舉時代之「陳迹」，「第四期科舉既變，八股既廢，於是《四書合講》、《詩韻合璧》、《大題文府》、《策府統宗》等，遂與飛蛇飛鼉、大麋大鹿，同為前世界之陳迹，不能不又有物焉代興其間也。」<sup>59</sup>傅斯年(1896-1950)則將此作為「煩瑣」的代表，事緣教育部頒布的「歷史課程標準」，傅批評此節目太細，教

<sup>57</sup> 〈論科舉改章之未善〉（論說），《中外日報》，1902年8月30日，第一版。

<sup>58</sup> 序中寫道：「記誦章句，不足言學，實事求是，爰錄諸家詮詁之說，故首以經史二部。三冬足用，宜明三才，故天算方輿次之。學古入官，心存君國，故帝學次之。專政優優，為國楨幹，故官制、選舉、循吏、儒林、文苑、禮學次之。黼黻羽儀，文經武緯，故禮制、樂律、兵制、刑法次之。治煩理劇，從政之選，故田賦、徵權、鹽鐵、農政、荒政、漕運、河渠、水利又次之。……」見吳頌炎輯，《策學備纂》（上海：點石齋，光緒十四年[1888]），頁1。

<sup>59</sup> 〈譯書略論〉（論說），《中外日報》，1902年10月10月14日，第一版。該文亦收入張靜廬輯註，《中國出版史料補編》（上海：上海書店，2003），頁60-65，題目改為〈論譯書四時期〉。

學內容過於煩瑣，「此標準之作者，似未見到幾個貫穿上下的原則，但忙於一代一代的堆積題目，弄得讀者覺得頗像一部份《策府統宗》一類書的目錄！」<sup>60</sup>清末出版的小說《九尾龜》，還這樣描繪投身科場的讀書人：「抱著一部直省闈墨，拚命揣摩；買了一部《策府統宗》，盡心摹仿。」<sup>61</sup>因此《策府統宗》一書，完全可以作為科舉時代此類書之代表。不惟如此，該書所呈現的「西學」，還可作為檢討其他策問資料的參照。說起來，是書輯錄的「西學」資料頗為有限，其「例言」就交待，「列海國上下兩類，分子目八，專輯海外今存諸國。詳稽源流，著其疆土物產，俾資考索。當世縱談洋務，故於戎事藝學纂錄，特詳公約公法，一併附及。惟入貢通商仍錄自前明而止。」同時在「天文」、「算學」部份加入了西學的內容。該書列有「引用書目」，此亦可見「西學」的情形。<sup>62</sup>明確表明「不采西學」的還包括 1898 年出版的《策論舉偶》，該書「凡例」就表示「茲編不采西學，因鄙性迂，拙西人語言文字，未嘗問津，不敢以不知者誤人，並非意為褒貶也。」<sup>63</sup>

上述諸書所顯示的「西學」的痕跡並不明顯，更說明科舉改試策論後對這些資料的編輯有重要影響。同樣是「策問」資料，科舉考試改試「策論」後，其內容有了很大改變。單從標題上即不難看出是圍繞「經濟」、「時務」、「政治」、「經世」做文章，以符合科舉改制的基本方針，最重要的信息便是與「西學」相關的知識，在這些資料中所佔比重愈益突出。這裡不妨舉證 1901-1903 年間所出版的幾種策問資料。

首先是 1901 年出版的《分類洋務經濟策論（增洋務十三編新政策）》，該書編輯工作稍顯凌亂，但標明「洋務經濟」，多少說明選編之原則。從其分目來看，大致包括有國政、外國、格學、礦務、通商、築路、養民、新學、利

<sup>60</sup> 傅斯年，〈閒談歷史教科書〉，收入傅樂成編，《傅斯年全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冊 4，頁 314。

<sup>61</sup> 張春帆，《九尾龜》（武漢：荆楚書社，1989），頁 448。

<sup>62</sup> 劉昌齡輯，《策府統宗》（上海：蜚英館三次印，光緒辛卯季春[1891]），頁 1-2。

<sup>63</sup> 謝甘盤評選，丁燮坤編訂，《策論舉偶》（板藏舊學山房，光緒戊戌[1898]新鐫），頁 1。

源、軍務、教務、雜學、稅考等內容。<sup>64</sup>《中外政藝策府統宗》則強調了「藝學」攸關於富強，指出西人以藝學致富強，凡鐵路、礦務、電學、化學、聲學、算學，「無一非藝學」。今中國力行新政以圖富強，改科學為策論，政治之餘，兼及藝學，亦知藝學實富強之始基，士之有志科名者，「孰不當精究藝學哉」。只是風氣初開，尚缺善本「足供揣摩」。是書之編即廣泛蒐輯各書院及名人「藝學之策」，「以資揣摩之助」。<sup>65</sup>

「經濟」、「藝學」之外，另一被廣為標舉的關鍵字乃「政治」，原因並不複雜，改革後的科學考試就言明考核「國朝政治」及「五洲各國之政」。1901年鴻寶書局石印的《中外政治策論彙編》，就突出了「政治」，「國家之所重在人才，人才之所重在學術」，「今天子勵精圖治，降詔改制藝為策論，且曰切實敷陳，不得仍鑿空行剽竊，求經濟之實學於士。士生斯世，宜上體聖心，以政治為當務之急，其有關於政治者，均宜曲證旁通。」該書「綱目具張，中外融貫，其所載皆有裨於政治，足為多士參考之資，拜足為國家培植人才之一助也。」<sup>66</sup>1902年上海鴻文書局石印《萬國政治叢考》，其「編輯大意」也明確表明「此書謹遵上諭改試政治藝學策論之語」，所分類目，所採書籍，「皆考政治者所究心之事」。<sup>67</sup>

正因為這些資料乃應時之作，其編輯工作，乃至印刷，頗有些「急就章」的意味，皆是為應試士子提供「揣摩」之本。稍後出版的資料，就逐步提升了「西學」的分量。1902年所印《中西經濟策論通考》，收有三篇序文。其中一篇就特別檢討了此前的一些出版物：自海禁宏開，談時務及洋務者不下數千百家，類皆補苴成帙，土飯陳羹，不足以資考證，未有如《中西經濟策論通考》

<sup>64</sup> 仲英輯，《分類洋務經濟策論（增洋務十三編新政策）》（介記書局，1901年石印）。

<sup>65</sup> 陳文洙，〈序〉，見譯書會主人編，《中外政藝策府統宗》（上海：中西譯書會，光緒辛丑仲冬[1901/1902]印），頁1-2。

<sup>66</sup> 〈序〉，見鴻寶齋主人編，《中外政治策論彙編》（上海：鴻寶書局石印，光緒辛丑[1901]印），頁1。

<sup>67</sup> 〈萬國政治藝學叢考序〉，收入朱大文輯，《萬國政治叢考》（上海：鴻文書局石印，光緒壬寅[1902]），頁1-2。

一書之廣博采搜。該書分門二十四種，後附西學八種，「皆切於勢務，關於時事，五花八門，引人入勝，可以長見識，審時世，以之體國可為平治資，使於四方不貽隕越差。是此書誠有裨於民生國計也大矣。」另一篇序文則談到，「今奉諭旨廢八股而用策論，頒行一切新政，多采西國之長以補我中國所未逮，舉世風氣駸駸乎以西學是趨。」該書之編正是「折衷於中西之間，以求合乎時務」。第三篇序文乃編輯之自序，內中也強調，「當今之時，處今之世，廢八股而崇策論，且尤必以西學為先。此蓋我皇上慨時文之弊，觀時事之孔堅，故銳意整頓，倡言改革，欲得天下經濟之才而輔治者也。」此書「雖不敢謂當世之巨觀，未始不可為報時利器者之一助」。<sup>68</sup>接下來要重點討論到的《中外策問大觀》，也應對著這樣的時勢。

大致說來，上述舉證之「策問」資料，其編輯緣起差不多一脈相承，各種序文或編輯大意，論證的方式也如出一轍。先是援據歷史大談「策論」最切於時事而見可於經濟，言必稱董氏之「賢良三策」，陸賈之「陳政事一疏」，及蘇氏一門父子兄弟三人之「策略傳世」。然後轉向對清季以制藝取士之檢討，表彰今天子降明詔廢黜八股，乃「審乎勢務，明乎時事，而善用其革也」。最後才言及此前所輯之書五花八門，目不暇給，以突出自己所編資料「遠勝坊間所出各書」，當可為「科第之津梁」，抑為「富強之嚆矢」。<sup>69</sup>這樣的表述，幾乎每種資料皆如此，一般都清楚交代這類書籍之編纂是為士子提供適應新的考試樣式的資料。同時，資料均係彙集而成，所採集的對象則緊扣其主題，於

<sup>68</sup> 秦榮光輯，《中西經濟策論通考》（深柳讀書堂印，光緒壬寅[1902]），內頁署〈華亭姚肇灝松泉甫選定，上海秦榮光月汀甫參訂，雲間郭曜五峰甫校字〉，序文分別署「光緒壬寅孟春慈溪陳邦瑞瑤圃氏諡序」，〈光緒壬寅仲春華亭姚肇灝松泉氏序〉，〈光緒壬寅仲春上海秦榮光月汀氏自序〉，頁1-3。

<sup>69</sup> 光緒壬寅(1902)所刊印的《中外經世策論合纂》，於此就有明確交待。「有志者如能家置一編，揣摩簡練，征持可以資條對佐論說，即出而與家國事，措置綽有餘裕，則是書為造士之利器，可為經世之利器，亦無不可。」還指出：「方今世界維新，掄才易轍，經義之外首重策論，習學者非留心經世之書不可。……是編也，為科第之津梁歟，抑為富強之嚆矢歟。」該書收有兩篇序文，分別署〈光緒壬寅初夏古董涵青氏序於滬北之鴻雪齋〉，〈龍飛光緒二十八年歲次壬寅八月蕭山黃元壽撰，錢塘王仁治書〉。見聽秋舊廬主人，《中外經世策論合纂》（上海：鴻雪齋仿泰西法石印，光緒壬寅[1902]），頁1-2。

是各種「經濟」、「時務」、「政治」、「經世」、「西學」、「格致」彙編資料成爲選擇的對象（詳後）。

要全面展示晚清配合科舉改制所出版的諸多「策問」資料，幾乎是不可能的；而要評估其出版發行的情況，同樣是困難重重。但其影響於買書者與賣書者，卻是可以稍作說明的。皮錫瑞(1850-1908)在日記中便展示了這一幕，1898年初他就有此判斷，「此間聞變科舉之文，西學書價必大漲」。於是翻看梁啟超所著《西學書目表》，決定「其中佳者，將購數冊閱之」。次日，皮果真與其弟其子去購買新書報。日記中皮錫瑞還記載了書商受科舉改制的衝擊，當戊戌五月頒布廢除八股之上諭，江西書商晏海瀾便發出這樣的感歎，「廢時文去二千金貲本矣！」<sup>70</sup>劉大鵬也注意到時務書籍的銷售，「時務等書，汗牛充棟，凡應試者均在書肆購買，故書商高抬其價，此皆名利之心。」<sup>71</sup>這方面，開明書店留下的紀錄，足茲參考。該書店 1901 年到金陵售書，清單如下：「歷史」（38/893，前一數字爲種類數，後一數字爲銷售數，下同）、「地理」（19/337）、「政法」（27/533）、「經濟」（6/168）、「教育」（7/94）、「科學」（28/427）、「報章」（5/189）、「文編」（9/282）、「科場書」（5/46）。很明顯，所銷之書，以歷史爲多，原因有二：「一、史皆事實，故譯筆率皆暢達，便於省覽；二、此次科場，兼問各國政事，故不得不略求其端緒。」但何以科場書銷售情況不理想呢？作者解釋了其中的緣由，「科場書非吾輩注意所在，所攜極少，故銷數若是，通常坊店皆什伯是，而未可據爲準則也。」<sup>72</sup>後來，他們一行人又到了汴梁，載書二十餘箱，爲數計二百餘種，從中也瞭解到購書者的情況：

其最多之多數，必問《通鑒輯覽》、《經世文編》，甚至或問《子史

<sup>70</sup> 皮錫瑞，〈師伏堂日記(1897-1900)〉，光緒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五月二十日（1898年2月10日、7月8日），分別見《湖南歷史資料》，1958年第4期，頁89；1959年第2期，頁123。可以補充的是，晏海瀾曾與袁清舫編有篇幅達508卷之巨的《西學三通》（萃新書館精本）（上海：文盛堂石印，1902），這是晚清頗有影響的西學彙編資料，此亦可看出當日書商如何應對時局，並且介入出版。

<sup>71</sup>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光緒二十九年三月初六（1903年4月3日），頁121。

<sup>72</sup> 公奴（夏頌萊），〈金陵賣書記〉（1902），此據張靜廬輯註，《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甲編，第3輯，頁384-402。

精華》、《四書味根》、《五經備旨》者，此皆未脫八股詞章窠臼者，為最下乘。其次則問《商權》、《扎記》、《掌故彙編》、《九家古註》、《七經精義》等書，是為舊學中已得門徑者，為次下乘。若購覓《朔方備乘》、《航海圖經》及《泰西新史》、《政治藝學全書》等，則漸有新舊過渡思想，臨文時能解調查者，為中下乘。至講求公法，詳考路礦，採訪學制，搜討兵政，東西各書籍者，雖不外得第起見，然已預備得第後之進步，是為中乘。若考察理化各科，工商諸業，殖民政策，建國主義者，其胸中已有成竹，特假文場為發揮地，不繫心於得失者，是為上乘。至留心民約、社會、立憲、國法，則其思想已臻極點，方針已有定向，行所欲行，止所欲止，是為更上乘。<sup>73</sup>

透過當時報紙刊登的廣告，我們也可瞭解這些資料是如何被推銷的。以《中外日報》來看，1901年11月25日的出版廣告就涉及「新輯經濟時務策論初二編廣告」、「新出皇朝經濟文新編」及「皇朝經濟文初編出書」等。「新輯經濟時務策論初二編廣告」這樣寫道：「是書周君仲芬先生編輯近時經濟實學策論，初編類分八門，曰國政，曰文學，曰邦交，曰地學，曰武事，曰商務，曰農工，曰工政，成書八卷。又輯二編六卷，國學、商政，海防、稅則、武備、近時變法、儲才，無不采輯，公諸同好。……有志留心時務者必以先睹為快也。」「新出皇朝經濟文新編」也標榜「是書共分二十五類，凡本朝政治掌故，各國兵律農商諸大端無不賅備。……」而「皇朝經濟文初編出書」則寫道：「是書為自強齋主人所輯，專以講求經濟為宗旨，內分八門，一學術，二治體，三吏政，四戶政，五禮政，六兵政，七刑政，八工政，誠為講求經濟者必需之書也。……」1901年12月2日的書籍廣告，除繼續告示「皇朝經濟文初編出書」、「新出皇朝經濟文新編」，新增加了「新出四書五經義策論初編」。1904年7

<sup>73</sup> 文中還透露了別的書商已先行一步，汴省「向無售新書者，去秋有上海友人開設時中書社，所售皆場屋書，間帶新書，頗有顧問者。」見王維泰，〈汴梁賣書記〉（1903），收入《中國現代出版史料》，頁403、408-409。周振鶴整理的晚清營業書目，也展現了各種「策問」彙編資料的發行銷售情況。見周振鶴編，《晚清營業書目》（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

月1日，則登載了《新選經義策論文法》（文法書最善本）的一則廣告：「是書內容蓋取時人傑作，擇其合於繩墨而可學者」，突出了這樣的意思——「學堂學生所必用，應試士子所必用。」<sup>74</sup>

《申報》書籍廣告中，涉及這方面的內容也可謂多矣。1903年點石齋登載的一則〈新印《策論講義淵海》出售〉廣告，就頗為典型地反映了出版這類書籍的基本訴求：

自科舉變制後，凡各省科歲考以迄鄉會殿廷諸試皆崇尚四書五經義及各種策論，以求實學有用之才。士人有志觀光莫不欲得一楷模以資研究。惜近時坊間新出名目雖夥，類皆駁雜不純。欲求抉擇精嚴三長並擅者，蓋憂憂乎其難之。本齋廣延名宿，按照功令所重，編輯是集。共分四門，一為中國政治策論，一為各國政治策論，旁及西藝格致諸論說，一為四書五經義，一為歷朝掌故論。都凡五千餘篇。有美必備，無義不搜，誠求名之捷徑，指迷之金針也。每部裝訂廿四本，定價洋銀四元。點石齋謹啟。<sup>75</sup>

不惟如此，1903年鄉試剛過，圖書集成局就陸續彙集各省闈墨，在《申報》頭版大做廣告。其中「浙江闈墨出書」這樣寫道：「浙闈榜發，本局即倩浙省友人覓得聚奎堂原本，飛速遞來，用新鑄鉛字照排印，以中國潔白連史帙校對，格外詳盡，毫無亥豕之訛。現已出書，每本價洋一角二分。欲先睹為快者，請即臨申報館及各書坊購取可也。」<sup>76</sup>不日又有〈新印江西闈墨出售〉的廣告：「江右為靈秀之地，龍蟠鳳逸，作者代興。本科慶榜宏開，闈藝傳來，傑構鴻篇，尤多戛戛獨造。本局特用新鑄鉛字，急為排印，讎校精詳。每本售價洋銀一角二分，今日出售，此布。」<sup>77</sup>幾天以後，廣東、江南闈墨也在推銷中。

<sup>74</sup> 以上均見當日的《中外日報》。

<sup>75</sup> 〈新印《策論講義淵海》出售廣告〉，《申報》，光緒廿九年五月三日（1903年6月8日）。

<sup>76</sup> 〈圖書集成局啓，「浙江闈墨出書」〉，《申報》，光緒廿九年九月十七日（1903年11月5日）。

<sup>77</sup> 〈圖書集成局啓，「新印江西闈墨出售」〉，《申報》，光緒廿九年九月廿一日（1903年11月9日）。

略為梳理「策問」資料在科學改制下的出版情況及其類目的安排，無疑可以說明「策問」對接引西學知識所具有的媒介作用；對於「策問」在晚清的特殊性，也有初步的瞭解。基於此，進一步探討「策問」以什麼方式反映西學知識，也有相應的基礎。

### 三、「策問」、「經世文編」及其他

張謇 1901 年為鴻寶書局石印《中外政治策論彙編》作序時，特別提到讀此書的感受，該書「由治道學術以迄海邦，共十六門，大致與魏氏源之《經世文編》相近，皆《文獻通考》之支流，而取法於《周官》之區分門類者也。」<sup>78</sup>1902 年刊印之《中西經濟策論通考》，也提到，「策論之最切於時務而見可於經濟才者」，「漢有董子賢良三策，賈生陳政事一疏，宋則蘇氏一門父子兄弟三人均有策略傳世尚也。近如歷代名臣奏議皇朝經世文編，洵洋洋乎大觀也。」<sup>79</sup>這些表述，自有其深意在。實際上「策問」作為一種特殊的考試形式，其在科學改革中成為關注的焦點，與晚清「經世致用」思潮之興起密切相關，實有必要對此略加說明，以把握「策問」地位提升所預示的學術轉向。而對晚清出版的各種「經世文編」、西學彙編資料稍作梳理，則不難看出，各種策問資料，尤其是本文檢討的《中外策問大觀》，其所列類目與同時代出版的「經世文編」與「西學彙編」，頗為相似。因此，也有必要對那些年廣為刊刻的「經世文編」及各種西學彙編資料加以檢討，以更好說明「策問」的「思想資源」，並展現晚清「西學」傳播的方式。

如同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揭示的，清學分裂的主要原因，乃極幼稚之「西學」知識與清初啟蒙期所謂「經世之學」相結合，別樹一派，向正統派公然舉叛旗。<sup>80</sup>中國思想史的研究者也強調，1890 年後的十年是中國思想發

<sup>78</sup> 署〈光緒辛丑小春月南通州張謇序〉，收入《中外政治策論彙編》，頁 1-2。

<sup>79</sup> 署〈光緒壬寅仲春華亭姚肇灝松泉氏序〉，收入《中西經濟策論通考》，頁 2。

<sup>80</sup>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收入朱維錚編校，《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上海：復旦大學出

展重要的分水嶺：儒家經世致用的思想傳統趨於告終，而尋求今天仍在摸索中的思想新方向被提了出來。<sup>81</sup>毋須多言，經世致用思想確算是晚清中西思想溝通的重要津梁，各種「經世文編」資料，也成為西方知識如何被接引的重要參考。自晚清至民國初年，曾有二十餘種「經世文編」相與賡續。這一現象的出現，固可說是「經世致用」思想已深入人心，同時也是因為對「經世」之理解，代有不同。<sup>82</sup>單從各種「文編」的類目看，即可發現其中所顯示的「知識」之遞升，不同版本的「經世文編」實際構成「呈現」西方知識的基本資源。<sup>83</sup>

劉廣京稱魏源所撰〈《皇朝經世文編》敘〉，「不啻為晚清經世運動之宣言」，<sup>84</sup>可謂見道之論。《皇朝經世文編》計分八綱六十五目，因立於傳統學術架構，正可以此檢驗後出之各種「經世文編」如何因應風氣之轉移。葛士濬(1845-1895)即是慨於「世局既有變遷，議論因之日積」，1888年編成《皇朝經世文續編》刊行。其中最突出的即是「洋務」思想納入「經世文編」中。專設有「洋務」一綱，繫以七目：洋務通論、邦交、軍政、教務、商務、固圉、培才。內中文字除我們熟知的那些洋務官員及出使外洋的外交官的奏疏文章，還收有丁韞良(W. A. P. Martin, 1827-1916)有關外交的文章 15 篇。只是這裡也顯示出對於這些新知，該如何安置，還沒有什麼辦法，只好「且將新酒入舊瓶」。<sup>85</sup>

---

版社，1984），頁 59。

<sup>81</sup> 張灝(Hao Chang),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中譯見崔志海、葛夫平譯,《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頁 211。

<sup>82</sup> 如俞樾(1821-1907)在〈皇朝經世文續編序〉中談到的,「近年風會日辟,事變益繁。如洋務為今日一大事,非原書海防所能盡也;奉天、吉林、新疆、臺灣各設行省,因地制宜,非原書吏治所能盡也;開礦自昔有禁,而今則以為生財之大道,非原書錢幣所能盡也;軍國之用,取給抽釐,非原書榷酷所能盡也;有輪船以行江海,近又有輪車以行陸,非原書漕運所能盡也;中西算學日新月盛,朝廷辟館以造就人才,且寬其格以取之,非原書所能盡也。」見葛士濬輯,《皇朝經世文續編》(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sup>83</sup> 關於「經世文編」的情況,可參見日本近代中國研究委員會編,《清朝經世文編總目錄》;黃克武,〈經世文編與中國近代經世思想研究〉,《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 2(1986年9月),頁 83-96。

<sup>84</sup> 劉廣京,〈魏源之哲學與經世思想〉,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頁 364。

<sup>85</sup> 其中引人矚目的是將「算學」列於「文學」目下。按葛的見解,「《賀編》學術文章類於經子

這一情況也反映在 1897 年出版的《皇朝經世文三編》。該書體例襲自葛編，卷首即是「學術」，分別為(1)原學上，(2)原學下，(3)法語，(4)廣論上，(5)廣論中，(6)廣論下（附醫理），(7)測算上，(8)測算中，(9)測算下，(10)格致上，(11)格致下，(12)化學。「學術」的內容已有較大改觀，然所做取捨，似乎又遠不是那麼回事。<sup>86</sup>

如何安置新學知識所出現的問題，不是這裡可以討論的，重要的是，從《皇朝經世文編》到《皇朝經世文續編》，再至《皇朝經世文新編》，「『經世文編』體的新學成分越來越多，舊學成分越來越少，其思想內容和學科分類，也不再是傳統經世實學所能涵蓋的了。」<sup>87</sup>這其中，麥仲華(1874-1915)所輯《皇朝經世文新編》，在編輯體例上就有明顯突破，該書共收文 615 篇，按 21 門進行編輯，分別是：通論、君德、官制、法律、學校、國用、農政、礦政、工藝、通商、幣制、稅則、郵政、兵政、交涉、外史、會黨、民政、教宗、學術、雜纂。梁啟超在〈敘〉中即稱讚此書「多通達時務之言，其於化陋邦而為新國有旨哉」。<sup>88</sup>該書還影響到後世「經世文編」的編輯，如《皇朝經世文續新編》，即是如此。該書又名《續經世文新編》，儲桂山輯，收文 558 篇，類分 30 門：大局、時勢、交涉、輿地、政治、防務、兵學、火器、兵制、海軍、西政、西學、天文、格致、文學、工藝、製造、商務、理財、河工、農利、醫學、鐵路、礦務、刑律、育才、教務、錢幣、吏治、變法。張謇在〈序〉中就明確指出儲編與麥編之聯繫性，畢竟《皇朝經世文新編》刊行已五年，「識時俊傑之議論

---

史學大綱暨諸儒論文，採取略備，而仍不及算學。」於是將有關天文算學的文章析為三卷，俯列「文學卷」。見〈皇朝經世文續編·例言〉，收入葛士濬輯，《皇朝經世文續編》（廣百宋齋校印本，光緒十七年[1891]）。

<sup>86</sup> 譬如「學術」裡列出「化學」，本已蹊蹺，耐人尋味的是收錄的文章：〈中外化學名詞異同考〉、〈物體凝流二質論〉、〈物體本原〉、〈電報〉、〈電學考〉、〈（問鍛）煅煉金質試驗熔度而電池之金何以必用一陰一陽方能生電說〉。其中一些文章，歸到「化學」，無論如何是不恰當的。見陳忠倚輯，《皇朝經世文三編》（台北：文海出版公司，1972），卷十二學術十二，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76 輯，冊 1。

<sup>87</sup> 馮天瑜、黃長義，《晚清經世實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尤其是第 11 章〈晚清「經世文編」的編纂〉，引文見頁 577。

<sup>88</sup> 梁啟超，〈敘〉，收入麥仲華輯，《皇朝經世文新編》（台北：文海出版公司，1977），頁 1-2。

漸積成帙，充滿於案頭，而紛亂不可檢讀者，指不勝屈」，而經世之書本有「轉瞬即為舊物」的特點，「欲補救當世之弊，亦非時作續貂之請不可。」<sup>89</sup>《皇朝經世文續新編》1902年出版，正可與《中外策問大觀》加以對照。

「經世文編」之外，可茲參照的，還包括晚清大量出版的西學彙編資料。有道是「要把金針度於人」，應該說，試圖整體上對西學進行全面介紹，在晚清並不鮮見，顧燮光(1875-1949)〈譯書經言錄·自序〉曾述及其中所發生的轉變，<sup>90</sup>大致描繪了晚清西學彙編資料的情況，所提及的《西學書目表》、《東西學書錄》、《譯書經眼錄》等資料，就顯示了斯時在整體上對西學的把握，尤其在類目上的安置情況。<sup>91</sup>

梁啟超 1896年完成的《西學書目表》，大致按照「學」、「政」、「教」對西書進行分類，除教類之書不錄外，其餘諸書，分為三卷：上卷為西學諸書，包括算學、重學、電學、化學、聲學、光學、汽學、天學、地學、全體學、動植物學、醫學、圖學；中卷為西政諸書，包括史志、官制、學制、法律、農政、礦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下卷為雜類之書，收錄遊記、報章、格致，「總曰西人議論之書，曰無可歸類之書。」應當承認，無論是「學科」的分類，還是具體的安置，《西學書目表》都有可稱頌之處。只是同樣也顯示出「舊瓶」不能裝「新酒」，如分出「報章」，就殊難理解，此乃就體裁論，非按內容來分。<sup>92</sup>徐維則輯錄的《東西學書錄》計分 31 門：史志、政治法律、學校、交

<sup>89</sup> 張謇，〈序〉，收入儲桂山輯，《皇朝經世文續新編》（義記書局石印本，光緒二十八年[1902]）。

<sup>90</sup> 內中寫道：「清光緒中葉，海內明達懲於甲午之變，發奮圖強，競言新學，而譯籍始漸萌芽。新會梁氏著《西學書目表》及《讀西書法》，學者方有門徑。老友徐君以恐病其略焉，乃仿提要例而有《東西學書錄》之作，蔡子民先生敘之。是時燮光醉心新學，日以讀譯書，是務為補其闕，由徐君合印以行，而子民先生復識之。匆匆三十餘年矣，嗣後燮光遨遊南北，迄光緒三十年止，又讀譯籍約千餘種，乃踵徐書前例，著為《譯書經眼錄》一書，棄諸行篋有年。」顧燮光，〈譯書經眼錄·自序〉，收入王韜、顧燮光等編，《近代譯書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頁401。

<sup>91</sup> 顧燮光提到的書目，只是一些較為流行的西學彙編資料，更早的資料亦不少，譬如初版於1888年的《西學大成》。該書為「有志泰西經濟之學者」所編定，介紹的「西學門徑」包括有算學、天學、地學、史學、兵學、化學、礦學、重學、汽學、電學、光學、聲學等12門。見王西清、盧梯青編，《西學大成》（上海：醉六堂書坊，1895）。

<sup>92</sup> 梁啟超，《西學書目表》，收入夏曉虹輯，《〈飲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涉、兵制、農政、礦務、工藝、商務、船政、格致、算學、重學、電學、化學、聲學、光學、氣學、天學、地學、全體學、動植物學、醫學、圖學、理學、幼學、宗教、遊記、報章、議論、雜著。<sup>93</sup>而顧燮光《譯書經眼錄》則明確表示係繼《東西學書錄》而作，「著錄各書由前清光緒二十八年至三十年止」，為卷凡八，為類凡廿五，包括：史志、法政、學校、交涉、兵制、農政、礦務、工藝、商務、船政、理化、象數、地學、全體學、博物學、衛生學、測繪、哲理、宗教、體操、遊記、報章、議論、雜著、小說。<sup>94</sup>

如同梁啟超在〈西學書目表序例〉中所表達的，「西學各書，分類最難。凡一切政皆出於學，則政與學不能分。非通群學不能成一學，非合庶政不能舉一政，則某學某政之各門，不能分。今取便學者，強為區別。」進一步還對照以往書目分類表示，「顧自《七略》、《七錄》以至《四庫總目》，其門類之分合，歸部之異同，通人猶或訾之，聚訟至今，未有善法。」<sup>95</sup>但從上述西學彙編資料不難看出，「經世致用」思想仍然是溝通西方知識之津梁。而對晚清所出版的各種「經世文編」、西學彙編資料稍作梳理，則不難看出，本文所要檢討的《中外策問大觀》，其所列類目與同時代出版的「經世文編」與「西學彙編」，頗為相似，甚至可將此看作綜合二者的產物。《中外策問大觀》所選策稿分類為 28 種，600 餘卷。計有治道、學術、內政、外交、時事、變法、科學、學校、官制、議院、政體、財政、圖法、法律、曆法、天學、地學、輿地、格致、教宗、兵政、防務、農政、工政、商政、路礦、中史、西史。這也從不同的側面表明「策問」地位之提升，正應對著這樣的思想格局，可將此視作中西交流的產物，乃新式知識登陸晚清的象徵。將《中外策問大觀》的類目

---

社，2005），下冊，頁 1144-1145。

<sup>93</sup> 徐維則所輯《東西學書錄》，1898 年出版，後由顧燮光補，改名《增版東西學書錄》。此據徐維則輯，顧燮光補，《增版東西學書錄》（無出版地及出版社，1902），頁 1-15。

<sup>94</sup> 顧燮光《譯書經眼錄》收錄譯書緊接《增版東西學書錄》（自 1902 年至 1904 年），該書 1935 年才由杭州金佳石好樓印行，但其編輯時間是 1904 年，因此大致反映的是二十世紀初年西書翻譯的情況。

<sup>95</sup> 梁啟超，〈西學書目表序例〉，《飲冰室合集》，冊 1，「文集之一」，頁 122-26。

與 1902 年出版的《皇朝經世文續新編》與《增版東西學書錄》加以對照，就可看出其分類大致是相似的。

由此，討論「策問」資料也當有此自覺，科舉改試策論，不僅催生了諸多「策問」彙編資料，還產生了別的效果，一是很多以西學、新學為名出版的書籍，也都受此影響。上海廣學會 1898 年出版的《新學彙編》即表示，「承明詔廢棄時文振興新學，而是書適告成功，承學之士即可於是取材，殆所謂不謀而合，且恭逢其盛者歟。海外旅人十餘年孜孜矻矻，不同於空言之無補，撫衷循省，何幸如之哉。」<sup>96</sup>李提摩太充滿感性的話，多少說明一些問題，顯示改試策論與西學頗為攸關，也催生了各種西學彙報資料。同樣值得重視的是，應試士子因應科舉改制的需要，並非全以策問資料為參考，還會矚目西學資料，1897 年，上海鴻文書局石印的《西學二十種萃精》就指出：西學盛行，遍於郡國，雖制藝八股如江河之不廢，士大夫自當究心於天文、輿地、富國、強兵諸大端，以起衰而救時弊。然「近時新出諸書間多抄錄章奏論說，糟粕雷同，互相沿襲，求其攸關實用者千不一。海東張君逮孫慨然以扶持世運為己任，曾遊歷歐美諸大國，搜羅西籍，博引繁稱，都為二十卷。今春因友人之請，付諸剞劂，以公同好。若徒為應試諸君作考場懷狹之具，則淺之乎視張君矣。」該書另一篇〈敘〉也明確道出：「方今我國家延攬人才，講求實際，董生對策，學究天人，賈誼上書，慷慨經濟，信人文之蔚起，助國運之昌明。然聖朝之掌故可稽，而列國之典章未備，未免闕如。爰請之先生將是書編付諸手民，以公同好，補東觀之異書，觀西邦之風氣，豈惟是作枕中秘而為矮屋中人之一助云爾哉。」<sup>97</sup>兩篇序言，都點出了科場改革之背景，甚至暗示可以作為科場考試挾帶之需。其〈例言〉說得更明確，「是書條分縷析，苟有志西學者逐類研求，即能洞悉時務。若攜帶入場，藉資佐證，尚非作書者本意。」這已經是明確昭

<sup>96</sup> 李提摩太，〈《新學彙編》序〉，收入上海廣學會編，《新學彙編》（上海：廣學會，1898），圖書集成局校刊代鑄，頁 1。

<sup>97</sup> 該書序言分別署〈光緒二十三年仲夏同鄉飲雪軒老人序〉，〈光緒丁酉榴月端午後一日吳江陳傑仰蕃甫謹序〉，見張逮孫編，《西學二十種萃精》（上海：鴻文書局石印，光緒二十三年[1897]），頁 1。

示是書於科場之作用，無疑說明這類書籍出版的背景。

因此，結合「經世文編」與西學彙編資料考察各種「策問」資料的編輯，無疑是必要的。分析這些資料的走向，或可更加全面檢討晚清思想的發展。<sup>98</sup>綜合考察這些資料還可發現，其採集的對象往往大同小異，重複率極高。以《中外策問大觀》來說，其刊布的廣告，就言明其採集資料的對象：

從前春秋兩闈及學使者科試皆有對策，然所問者不過經史中瑣文碎義，於五洲政教萬國藝術無與也。自科舉改章，試場所命策題皆注重西政西藝，苟非研究於平日，何能爭勝於一時。華亭雷君曜孝廉有見於此，爰廣采近日輶軒使者之所試，與夫各省學堂課藝之最新者，擇其精要，輯為是編。為目二十八，為文千篇。言乎政則學堂、議院、郵章、稅則，無不詳。言乎藝則天文、地輿、聲光化電，無不備。與從前坊間所行諸策，其新舊優劣之間，有識者固可一覽而知矣。現已付之石印，即日出書。每部十二本，價洋一元六角。欲購者請至上海掃葉山房、申昌書室、廣東文英閣、漢口江左漢記、蘇州掃葉山房選取可也。硯耕山莊主人謹啟。<sup>99</sup>

這裡清楚交待了其資料的主要來源，一是各省闈墨，一是新式學堂課藝。徐沅、祁頌威撰《清秘述聞再續》曾列有科舉改制後各省考官及中式者的名錄，其中「光緒二十八年壬寅補行庚子、辛丑恩正並科鄉試」各省解元如高毓淝（順天）、曹清泉（江南）、龍元勳（江西）、劉焜（浙江）、寶玉瓚（湖南）等人，都有答題收入《中外策問大觀》。<sup>100</sup>此外，還有不少內容取自前述「格致書院課藝」及廣學會舉辦的有獎徵文。

<sup>98</sup> 關於這方面更詳細的討論，可參見章清，〈中西歷史之「會通」與中國史學的轉向〉，《歷史研究》，2005年第2期，頁75-95；〈「采西學」：學科次第之論辯及其意義——略論晚清對「西學門徑」的探討〉，《歷史研究》，2007年第3期，頁107-128。

<sup>99</sup> 〈《中外策問大觀》廣告〉，《申報》，光緒廿九年五月廿五日（1903年6月20日）。

<sup>100</sup> 徐沅、祁頌威撰，《清秘述聞再續》，見法式善等撰，《清秘述聞三種》（北京：中華書局，1982），下冊，頁992-996。有關作者的情況，還可參見顧廷龍主編，《清代硃卷集成》（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尤其是冊1、2之「科年簡目」及「科年目錄」。

#### 四、《中外策問大觀》所關注的「西學」

略為展示各「策問」資料的成書過程及其與「經世文編」和西學彙編資料的關聯，討論「策問」資料對「西學」新知的接引，也有了基本鋪墊。不過，即便集中於審視《中外策問大觀》所介紹之西學，也無法完全展開。與其他彙編資料不同，該書在各類目中均涉及到對西學的討論，將有關問題略加陳述，可大致看出當時對西學的關注所在。值得重視的是，「策問」既由兩個部份組成，也有必要略作區分。依拙見，從某種意義上說，策論之「發問」，較之所應之「策」，更加值得重視，因為「發問」之產生，表明此已成爲眾所關注的問題。同時，「策問」之「發問」也往往有明確的傾向性，多少規定了「應策者」回答問題的方向。畢竟「策問」作爲國家考試的一項內容，無論是「發問」者還是「對策」者，都是在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框架下言說。筆者從每一類目中選取了一些問題，大致可以瞭解哪些問題成爲關注的重心。

表 1 《中外策問大觀》之「策問」

類目	問 策	作 者
治道	問近日講求富強，莫不仿行西法，然西國行法而法立，中國行法而法壞。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試舉西人行法著效者以證，且西法不一，有宜於中國者，亦有不宜於中國者，盍區別言之。	來福貽
	問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近日士大夫震於泰西富強之術，或欲舍所學而從之，其會通爲兩可之說者，又援引比附，欲合中西爲一，非是則非，矯激爲迂拘，豈聖人禮教之防有時而窮歟？抑所見有不如後人之廣大歟？盍以所見言之。	何應璜
學術	西國學術導源希臘，其流派若何？教育各家孰爲最著？宗旨孰優？方今博采良法，釐定學制，試陳勸學之策。	劉 焜
	東西政藝之書新舊迭譯，卷累千百，然其中有立說偏宕不合中國之情勢者，有新說盛行舊說已成筌蹄者，議論歧出，折衷匪易，試爲報其英華，略其蕪雜，分別部局，論定大旨，爲學人導其門徑策。	劉邦驥
	洋務書浩如煙海，學者何從下手。	張光照
	譯西書策。	陸鐘渭

內政	泰西善舉甚多，除育嬰、施醫、禁酒、自新、恤孤、勸和、訓啞、教聾等會外，又有恤貧院，凡丐食街市及無業遊民收入院中，教以淺近手藝，至期藝成得以自養。諸院有設自國家者，有捐自官紳者，每歲所集經費自十萬數十萬不等。竊思古者發政施仁，凡有鰥寡孤獨窮民之無告者，皆在所撫恤。然則恤貧院亦當今急務，不識當道與富紳能立此公德否？應若何籌款，其章程如何始能悉臻善舉。請切實指陳，以備采擇。	許象樞
	擬仿英國《泰晤士日報》例各省編設官報局與電報、郵政並行以期廣開風氣策。	缺 名
外交	中外和約條款有應增者，有應刪者，有應變通者，試援據《萬國公法》以備修改約章之時採用。	儲桂山
時事	外人動曰睦中國、新中國，中國有無使人睦能自新之善策。	朱震修
	西人以通商為重，何以又思占我土地，試詳言英、俄、法、德諸國命意所在。	儲桂山
變法	問西法合於古法者何在？試詳言之。	陳鐘懋
科學	討論歷代科學，未涉及西方。	
學校	問近日中國遍開學堂勉習西學，其一切器藝雖皆本諸中華，而鄉邑之間似倡絕學。今已廢八股、罷武科，何由而如泰西學校蒸蒸日上，試抒所見以對。	來鴻瑋
	問近人出使外洋或遊歷各國，撰述頗多，其最精核有用者何書？今欲廣勸遊歷，令各直省府廳州縣均須公舉通才，就地酌資以助旅費。其法果可行歟？若何而章程善盡，試悉心籌之。	彭世襄
	明艾儒略述泰西建學凡六科，曰勒鐸理加，曰斐祿所費亞，曰默弟濟納，曰勒義斯，曰加諾搆斯，曰陡祿日亞。今已各有刪並損益，可觀縷以言之歟？	陳漢章
	問學堂之制規仿東洋，其修身倫理科視中國之性理學，得失異同奚若？憲典一門即中國之政治，學習而精之有裨實用否？	王震昌
官制	問本朝會同四譯館之設仿於何代？繼設總理衙門，或亦稱為譯署，其閣員額有無添置裁併？今改外務部，其同異何在？試詳論之。	朱錦綬
	問借材異地古時類然，今中國欲明習泰西，各學教習必延西人，何以核實學而得真才歟？	缺 名
	中國有迴避，西國無迴避，中國六部執掌屢更，西國終身不易，得失若何？	汪康年
議院	中國有學校無議院，西人設立議院，或謂有合於古學校，其異同若何？	王慶洛

	考泰西於近百十年間各國皆設立上下議院，藉以通君民之情，其風幾同於皇。古書有之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曰，眾心成城。設使堂高廉遠，則下情或不能上達，故說者謂中國亦宜設議院以造輿情采清議，有若古者鄉校之遺意，苟或行之，其果有利益歟？或有謂行之既久，不無流弊，究未悉其間利害若何。能一一敷陳之歟？	許象樞
政體	俄主專制，英主立憲，美主共和，政策之宗旨不同，國民之感動頓異，試抉其利病得失之數策。	缺名
	問君主國民主國之國體與政體及其統治之機關若何？	缺名
財政	國債一項西國多有，能行之中國否？	陸鐘渭
	西國財政合於計學達例若何？得失安在？今日度支奇絀，理財尤亟，富國之術雖多，而措施宜有次第，權衡緩急，孰為要策？	吳道晉
	問理財學之研究與推算國富之法之關係。	缺名
圖法	問昔有行鈔之法，多因滋弊而罷。各部局鬚髮銀錢，各幣必恒示天下以信。應如何變通古制參用西法，詳酌時宜俾可通之四海，行之百年，免匱乏而保利權，便商民而濟國用策。	李經邦
	各國改用金幣始於何時？金價日增其故安在？主之者何人？若中國償款用金，虧損甚巨，擬亟籌抵制之方策。	程起鵬
法律	問各國立約章本為彼此民人往來營生起見，設今有一國議欲禁止有約之國人民來往，其理與公法相背否？能詳考博徵以明之歟？	缺名
	《萬國公法》一書西人交涉視為準繩，然所以用公法之柄則仍以國勢為斷，強者每取盈於公法之外，弱者每受損於公法，必如何始濟其平策。	傅爾貽
	西國法律原於羅馬，沿革若何？今法律之學為科凡幾？自治外法權行於通商口岸，受病甚深，規復主權宜用何策？	俞鳳韶
曆法	問中曆至授時而法始密，大統曆悉本授時，與回曆並行，尚不及回曆之精。時憲參用西法，超軼前代，行之數百年始有微差，其異同得失可得而言歟？	程兆璽
	問中法以冬至起算，西法以春分起算，其術孰優？	儲桂山
天學	五大洲共一天也，何以天變獨應於中國？風雲雷雨皆起於何地？何以列於天文？地有五材，天有五星，或言精氣相通，能糾其謬歟？	陳文
地學	問天圓地方經籍通義，今用西法測量，知地成圓球形，視以平地測地者較確，徵諸中國古籍亦嘗有其說否？西法測天以平弧三角，合之中算勾股異同若何？	韓子庚
輿地	地理學者首資測繪，何器最要？何法為簡？今天下大洲五，始夫地域形勢之殊，爰有風俗政教之異，試源關係之理兼籌固圉之策。	胡仁源

格致	西人精求格致，類多就物土之宜悟出農工專門之業，然新藝之振興無論繁簡若何，利用若何，必通譯其字義乃得端倪，試證其理策。	龍元勳
	問大學格致之說自鄭康成以下無慮數十家，於近今西學有偶合否？西學格致始於希臘之阿盧力士陶德爾，至英人貝根出盡變前說，其學始精逮。達文施本思二家之書行，其學益備，能詳溯其源流歟？	蔣同寅
	格致之學中西異同以中學馭西學策。	缺名
	歐洲格致多源出中國宜精研絕學以為富強之基策。	曹清泉
	西人所學大率皆格致之道，而大學聖經所言治國平天下，亦必於之致探其本，其用意是否相同，盍即其得失論之。	彭世襄
教宗	問羅馬為義大利所踞，教皇權勢已去，而中國教禍反劇，其故何在？	劉受謙
	問美洲各國宗教情形及歷來教禍之原因。	缺名
	西教所言多與格致新理不合，試學一二以例其餘。	楊象濟
兵政	問孫子十三篇兵家以為鼻祖，今泰西用兵之法亦多有得其遺意，著能臚舉以證明之歟？	包錫咸
	泰西之強曰船堅曰炮利，夫彼船利海，我軍利陸，乃肇釁以來陸戰亦往往失利，其故何歟？中國購火器習洋操糜費千萬，迄無成效。禦敵之道在修其所未至歟？抑有足以無待外求者歟？	缺名
防務	防俄策。	程桂芬
農政	中西農政異同策。	魯林
	研化學之有關農務者俾助興農業策。	張登愷
	泰西農業博覽會考察之法策。	張緝光
工政	周秦諸子工藝之學與泰西異同策。	張錫典
	格致之學通諸制器，名理迭出，成器日新，試學新制闡其理用。自商約有內地製造之條例，權益將不振，欲圖補救宜操何策？	童燮梅
商政	各國會議商約欲在中國貿易無阻，如何抵制？試言其策。	陳煥章
	泰西商務競爭謂之商戰，中國應於何講求為抵禦之術策。	徐蓮芳
	西人之講商務也，據他人之利以為利，中人之講商務也，據自己之利以為利，其應如何奪彼之利保己之利，不隨不激，期於可行。	言思復
路礦	問開礦為周官遺利，泰西多以開礦致富，中國無論官辦商辦每致失利，其故安在？	來鴻瑋
中史	問自古為患天下者，內有盜賊，外有夷狄，皆巨患也。以後世言之，如晉室五胡之變，宋代金元之禍，瓦解席捲不可收拾，莫不謂制夷難於制盜矣。及觀唐文皇使李靖教侯君集兵法，君集疑靖故秘其術，致文皇誥靖，靖對以諸夏已定，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並不難於制盜。果何謂歟？抑此二者，各有所難也。其以讀史所見著於篇。	伍耀光

	問咸豐十年英法之變，群臣多議遷都秦地，曾文正獨不謂然，其故安在？	缺 名
西史	普爲法殘，卒成霸業，日本蕞爾，亦克稱雄。日皇得力維新，普王果操何道？	缺 名
	日本新政之行何者最先，何者成效最著。其一切改從西法，識者論其不無過當。而弊之伏於其間者，何事近。今有無補救之方，試條分縷析，切實指陳，以爲中國考鏡之資策。	陳曾矩
	泰西、日本維新以前一切弊政與中國多相類者，能條舉之否？	儲桂山
	列邦自強皆有所因，其情形若何？有君強，有相強，有士大夫強，何者爲上？君強者以誰爲最？	伊保元

透過這些問題，尤可注意的是爲「學」意識的提升，以及籠罩其中的援據歷史的論述方式。關於「學戰」觀念的起源及影響，研究者已多有揭示，指出晚清士人認識到中西文化競爭最終是一場「學戰」。<sup>101</sup>然這裡的「學」意味頗不同，昭示了基於「學科」提出問題，而非泛泛之「學」。如「財政」卷就列出：「西國財政合於計學達例若何？得失安在？今日度支奇絀，理財尤亟，富國之術雖多，而措施宜有次第，權衡緩急，孰爲要策？」「理財學之研究與推算國富之法之關係。」醒目標出了「計學」與「理財學」。「法律」卷則問及「法律之學」爲科凡幾？提出「西國法律原於羅馬，沿革若何？今法律之學爲科凡幾？自治外法權行於通商口岸，受病甚深，規復主權宜用何策？」「農政」卷還就研習「化學」與助興農業的關係提出「研化學之有關農務者俾助興農業策」。

以此而言，卷十九「格致」更值得重視。該卷收入了與格致之學相關的問題，其問題與答案，大致反映出晚清審視「格致之學」的視野，不妨參照其中所列三個問題略加辨析。一、「問：大學格致之說自鄭康成以下無慮數十家，於近今西學有偶合否？西學格致始於希臘之阿盧力士陶德爾，至英人貝根出盡變前說，其學始精逮。達文施本思二家之書行，其學益備，能詳溯其源流歟？」

<sup>101</sup> 參見王爾敏，〈商戰觀念與重商思想〉，收入氏著，《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198-322。

二、「格致之學中西異同以中學馭西學策」。三、「歐洲格致多源出中國宜精研絕學以為富強之基策」。顯然，此三策所凸顯的是「西學中源」與「中體西用」之故套，反映出晚清是恪守此研判「西學」。而第三策收有兩篇對策，說明即便問題如舊，但應策者已能從各「學科」來考慮問題。首篇對策指出西人之富強，均與「學」相關，「無化學，則農無培壅；無重學，則工無製造，礦無助力借力諸器；無聲光電諸學，則兵無耳目；無水學熱學汽學，則槍炮艦雷無運用；無幾何學，則諸科學並無托始之源。然則西人富強非他恃，有格致而已。」同時作者還強調諸學中「算學」佔據特別地位，「有幾何以為諸學之根底，然後研求冷熱漲縮之理而熱學精，研求浮沉托壓之力而水學精。」另一策則具體指出「研精之策」包括：「一曰知分科。格致學西文本意名曰萬有學，言研究天下一切之學也。萬有學分二大綱，曰萬有史學，即中國博物學；曰萬有理學，即中國格物學。博物學分為四目，曰動物學，曰植物學，曰礦物學，曰生理學。格物學分為二目，曰物理學，曰化學。而物理學更分五子目，曰重學，曰聲學，曰光學，曰熱學，曰電學。分科既定，則致力自易，而無駁雜不精之弊矣。」<sup>102</sup>這裡所言「分科」，不乏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是以「萬有學」（「天下一切之學」）定位「格致之學」，其次則是在西學眾多學科中，試圖發現彼此之間的關係。

至於援據歷史的言說方式，更不難理解。「信而好古」，不僅成為中國人做學問的一套主要方式，藉「託古」以爭正統在歷史上也時有發生。<sup>103</sup>及至晚清，由於社會變動不斷加劇，對過去的重新闡釋愈發突出。而「西方因素」的加入，對於「託古」之論述策略則構成有力的衝擊。在本文所討論的「策問」中，也曾表達這樣的看法，「大抵在當日而論當日之事，或難預知得失，及今論古，已有成局，即可了然。」<sup>104</sup>這樣針對歷史的設問，無疑強化了對「歷史」

<sup>102</sup> 雷瑛編，《中外策問大觀》，卷19，頁44-46。

<sup>103</sup> 錢穆晚年講學，就特別講到所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僅孔子如此，也是中國人做學問的一套主要方式。見錢穆，《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頁64。

<sup>104</sup> 參見(16)問晉祁欽、江統皆建徙戎議，果行其言，能弭五胡之亂否？以下所涉及「策問」的具

的期許。研究者已揭示了，清末民初史學走向「中心」乃「經世致用」思想所催生，張揚的是「史學所以經世」的主張，換言之，「史學」在晚清實際被當作應對各種現實問題的重要資源。<sup>105</sup>明乎此，討論「策問」中的「歷史」，稍能減少時間上存在的隔閡。而且，「歷史」課題之所以值得特別重視，乃因為除「策問」外，改制後的科學考試尚有「中國政治史事」的內容。

《中外策問大觀》最後兩卷為「中史」與「西史」（實際上其他卷次不少內容均可歸到「歷史」，這多少說明「策論」與歷史的密切關聯），不難看出，涉及「中史」之策問往往已由「西方因素」催生，歸到「西史」名下之「策問」，更表明面對「西方因素」如何援據歷史進行應對。其中一則問題是這樣表述的：「俾思麥可方中國何人？試以古事比附之。」這樣的提問方式，是當時會通中西歷史典型的表現形式，而綜觀「西史」卷總計 23 道「策問」，大略可作這樣的區分：（一）將中國之關切投射於外國歷史。往往是將當日中國所關心的問題投射於國外的歷史，如富強之由、治理之方及長治久安之道等，尤其重視「由弱至強」的例證。其中涉及日本的話題即有四條之多，關切日本之明治維新，及日本新政之行何者最先，何者成效最著。此外那些由弱轉強，或暫遭挫折的國家，也進入晚清視野。<sup>106</sup>（二）將中國之現實處境與歷史上之西方進行類比（或關於人或關於事）。<sup>107</sup>（三）涉及「西史」之內容多關切外交事務，試圖探索中國應對之道。<sup>108</sup>

---

體內容，均出自《中外策問大觀》，卷 27、28，不再一一註明。

<sup>105</sup> 羅志田，〈清季民初經學的邊緣化與史學的走向中心〉，收入氏著，《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學術與社會》，頁 302-304；彭明輝，《晚清之經世史學》（台北：麥田出版社，2002）。

<sup>106</sup> 如(3)問普為法殘，卒成霸業，日本叢爾，亦克稱雄。日皇得力維新，普王果操何道？(4)問法蘭西受創於德意志，不十年國勢復振，能言其故否？(5)問愛烈珊德之得民勝於大彼得，而彼國求新知人競起鬻俄，愛烈珊德幾受其創，其何故在？(18)問歐州政治何以能致富強？(19)問列邦自強皆有所因，其情形若何？有君強有相強有士大夫強，何者為上？君強者以誰為最？

<sup>107</sup> 如(11)問俄國大彼得其雄略頗與嬴秦相似，然始皇再傳而亡，俄則彼得以後方興未艾，功烈相伴，成敗迥異，其故安在？盍參考焉？(16)問泰西日本維新以前一切弊政與中國多相類者，能條舉之否？

<sup>108</sup> (6)問英併印度，俄滅波蘭，或以商務，或以賄賂，陰謀秘計若出一轍，近人顧謂，英為救人之國，俄為虎狼之國，許英抑俄，其故安在？盍證以往事，權其利害，剴切陳之。(17)問五洲各國大小相維，強弱相制，盟約相聯，莫能相併。近如美收古巴而與西戰，英助土與俄爭，普法

前已述及針對俾思麥(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的評說，其選錄對策就反映出援據歷史的方式。「對策」也標榜俾斯麥乃「九州之外」堪當「偉人奇士」之人：

俾思麥者，泰西德意志國之名宰相也。方其少時，征逐於紛華靡麗，嗜好乎貨利聲色，人皆以紈袴子弟目之，則有如不事生產之陳平。弱冠折節讀書，因遊歷法都，開闊耳目，遂慨然以國事為己任，則有如先憂後樂之范希文。爰立作相，奮發有為，其議論往往與議院相左，幾至罷相，則有如縱談時事旁若無人之王景略。與德皇威良第一君臣同德，終始委仕，事無大小，胥出裁決，而德皇不以為專，則有如總攬庶務之諸葛孔明。推廣商務，振興工藝，志圖富強，信賞必罰，舉行新政，不遺餘力，則有如變法定令之商鞅。矯枉過正，令出惟行，處國小而偏之地，而能以火烈民畏之政，寓其慈惠，則有如寬猛相濟之子產。經營數十年，志復仇讐，虜法之君，以報宿怨，敗奧之將，以摧強鄰，兵威遠播，德以中興，則有如連下齊城之樂毅。國合日耳曼三十六部，共尊普皇為盟主，遂使德意志之號，著名於五大洲，則有如九合諸侯之管敬仲。其始也受法人之制，兵額不得逾三千，而創為預備兵、後備兵之法，使兵農合一，人人皆可為兵，則有若初設府兵之蘇綽。嗟乎，世變日亟，需才孔殷，如俾相之明體達用，詎可多得耶？<sup>109</sup>

細數起來，由德國宰相俾思麥所聯想到的中國歷史人物就包括有：西漢時的陳平(? -B. C. 178)、北宋時的范仲淹(960-1052)、十六國時期的王猛(325-375)、三國時的諸葛亮(181-234)、戰國中期的商鞅(B. C. 390-B. C. 338)、春秋時期的子產(? - B. C. 522)、戰國時的樂毅(生卒年不詳)、春秋初期之管

<sup>109</sup> 之戰而日爾曼之盟合，日韓之役而俄德之交固，或迫於形勢，或動以利，各有隱情，試詳論焉。雷瑄編，《中外策問大觀》，卷28，頁9。經查證，此文乃胡志伊的〈問俾思麥可方中國何人試以古事比附之〉，收入甘韓編，《清朝經世文新編續集》（台北：文海出版社，無出版日期），卷21，頁1494。

仲（？- B. C. 645）、西魏時的蘇綽(498-546)，這些人無一例外的皆是所屬時代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功勳卓著。但作者並非以此認定俾思麥能「合諸人之所長」，反倒認為俾相之功業，誠不易及，卻也不能「合諸人之所長」：「有管仲之功而無其才，有子產之才而無其德，有希文之志而無其學，有孔明之遇而才德學皆遜之」。令作者深感可惜的是其「生於歐西，而不能不囿於歐西」，且問題出在西方文化本身，認為「耶蘇之教，棄遺君親，路得之書，絕滅倫理，俾相心知其非而不能禁革之」。因此，如俾思麥「習吾孔孟仁義之學，以教養其民，其立政必更有可觀」。單就此篇「策問」便不難看出，援據歷史尚不只是對過去的歷史重新闡述那麼簡單，明顯是將所守望的「中體西用」見解，投射於歷史人物。可以肯定俾思麥的功業他人難以企及，但對於其「品行」卻有所保留。之所以有所保留，未必見得是俾思麥本人在德行上有可招物議之處，卻是文化上「生於歐西」的「原罪」導致。重要的是，要培育當今之「全才」，「西人格致之功」外，不可缺少「大學誠正之理」。

除凸顯出「學科」意識的提升以及籠罩其中的援據歷史的論述方式，《中外策問大觀》所展示的審視「中西」之視野，也值得加以分析。名為「中外策論」，自是圍繞中西之間的話題展開論辯。實際上總計 28 卷中，除「科舉」卷討論歷代科舉未涉及西方外，其他卷次均是基於中外提出問題，內中之設問方式也有裨瞭解晚清是如何討論中西問題的。

其一，基於「中西異同」提出問題。往往都是舉證中西之間的區別，然後追問「其異同得失可得而言歟？」這其中包括有「各國學制之異同」（「學校」），「中國有學校無議院，西人設立議院，或謂有合於古學校，其異同若何？」（「議院」）「格致之學中西異同以中學馭西學策」（「格致」），「中西農政異同策」（「農政」），「周秦諸子工藝之學與泰西異同策」（「工政」）等。這還是指明確提出「異同」的，即便不以此設問，也往往基於此。重要的還在於，論辯中西之異同，為的是捍衛中國本土之價值。如「格致之學中西異同以中學馭西學策」所收兩篇策論，就守護於此。文章立足於中西格致之學風馬牛不相

及，強調，「中學之大，經緯萬端，以格致為入門之階；西學之精，機變百出，亦以格致為進步之矩」。不僅為中西學術之溝通確立問題的起點，還樂觀於這樣的結局：「西學之利在一時，中學之利在萬世。西學之益在物力，中學之益在人心。西人嘗云，百年後西藝當盛於亞陸，五百年後，孔教必遍於地球，是在吾輩同種之志士。」<sup>110</sup>

其二，恪守「西學中源」論。「地學」卷有這樣的問題：「天圓地方經籍通義，今用西法測量，知地成圓球形，視以平地測地者較確，徵諸中國古籍亦嘗有其說否？西法測天以平弧三角，合之中算勾股異同若何？」「兵政」卷則提出，「孫子十三篇兵家以為鼻祖，今泰西用兵之法亦多有得其遺意，著能臚舉以證明之歟？」而「格致」卷中，很多問題更集中於此：「歐洲格致多源出中國，宜精研絕學以為富強之基策」，「西人所學大率皆格致之道，而大學聖經所言治國平天下，亦必於之致探其本，其用意是否相同，盍即其得失論之。」「大學格致之說自鄭康成以下無慮數十家，於近今西學有偶合否？西學格致始於希臘之阿盧力士陶德爾，至英人貝根出盡變前說，其學始精，逮達文施本思二家之書行，其學益備，能詳溯其源流歟？」所收錄答卷指出：「今之論西學格致者，每謂與大學之格致不相合，蓋一則僅虛擬其理，一則必臻之於實學者。未有究源流，輒以中西二學而歧視之，非確論也。……要之物有本末，尤貴知所先後。古昔大儒，以格致為開物之資，故形上為道，而務求其本。西人以格致為闡物之源，故形下為器，而但求其末。如欲本末兼賅，則當以中學為綱，而以西學為目，二者兼資而並用之，庶幾無逐末之譏歟。」<sup>111</sup>這裡所強調的是中國之優先性，即先對格致之學有所闡述，西人也只是襲於此。

其三，關注於西學當如何選擇。「治道」卷的一則問題就這樣表示，「近日講求富強，莫不仿行西法，然西國行法而法立，中國行法而法壞。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試學西人行法著效者以證，且西法不一，有宜於中國者，亦

<sup>110</sup> 雷瑄編，《中外策問大觀》，卷19，頁44-46。

<sup>111</sup> 雷瑄編，《中外策問大觀》，卷19，頁1-2。

有不宜於中國者，盍區別言之。」這裡強調了「西法不一」，因此要區分「有宜於中國者，亦有不宜於中國者」。「學術」卷中的問題，則集中於辨析如何譯介西學：「東西政藝之書新舊迭譯，卷累千百，然其中有立說偏宕不合中國之情勢者，有新說盛行舊說已成筌蹄者，議論歧出，折衷匪易，試為報其英華，略其蕪雜，分別部局，論定大旨，為學人導其門徑策。」此外，「洋務書浩如煙海，學者何從下手」與「譯西書策」，也都關切西學之門徑或西學之次第。其他的「西國財政合於計學達例若何？得失安在？今日度支奇絀，理財尤亟，富國之術雖多，而措施宜有次第，權衡緩急，孰為要策？」（「財政」）也表達了相似的意思。如針對「中國藝學何以為最先」的問題，作者就強調「中國如興藝學，而最為先務者，則莫如製造、槍炮、兵艦及紡紗、織布、機器而已。槍炮、兵艦所以強國也，紡紗、織布所以富國也。」儘管沒有多少學的痕跡，但仍清楚交待了如何選擇成為關鍵。<sup>112</sup>

其四，強調防止西學之弊。「治道」卷列出這樣的問題：「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近日士大夫震於泰西富強之術，或欲舍所學而從之，其會通為兩可之說者，又援引比附，欲合中西為一，非是則非，矯激為迂拘，豈聖人禮教之防有時而窮歟？抑所見有不如後人之廣大歟？盍以所見言之。」「學術」卷也強調「立國之大防」不容或潰：「立國之道，曰政，曰教，曰學術，曰風俗，中國三代以上四者合為一。春秋至今，政俗隨時而變，政教學術尚尊孔孟，泰西則教與政學全不相涉，獨其風俗與教合。今日將求西學，兼采西政，乃取彼所長救吾之短，非習其教從其俗也。此中大防不容或潰，能就所知剖析同異得失歟？」至於「西史」卷更是立足於吸取他人之教訓提出問題：「日本新政之行何者最先，何者成效最著。其一切改從西法，識者論其不無過當，而弊之伏於其間者，何事？近今有無補救之方，試條分縷析，切實指陳，以為中國考鏡之資策。」此題收有兩條對策：陳曾矩之對策特別關注日本變革之次第，以及所產生的流弊，藉此也闡述對中國改革之意見。所強調的是，「觀其先後緩急

<sup>112</sup> 雷瑄編，《中外策問大觀》，卷19，頁2-3。

之序，則可以為我中國之前導；觀其卓著之成效，則可以為我中國之今日之柯則；觀其過當之流弊，則可以為我中國今日之車鑿也；觀其補救之方，則可以為我中國今日之成案也。故日本近三十年之歷史，實不啻我中國今日之榜式也。考察日本之政治者，其亦知所借鏡矣。」而劉邦驥之對策開篇即謂：「日本新政之行之最先，而行之最著者，非西法也，乃中學也。」特別指出日本改革之先導，乃取法「春秋尊王大義」。最後表示，「今天下競言變法，宜師日本矣，吾願取其利，尤宜鑒其弊也。敢以一言斷之曰：欲立國於不弊者，必自尊尊親親始。」<sup>113</sup>

## 五、餘 論

「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1905年9月2日頒布的諭旨，為延續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制度畫上了句號。科舉考試最後幾年的歷史是在紛亂中寫就的，真應了那句「計畫沒有變化快」，不僅變革方案多所反覆，運行有序的機制也亂了套。原定1901年舉行的鄉試和1902年舉行的會試，都推遲一年舉行，並改為恩正並科。同時，由於順天貢院被毀，癸卯、甲辰兩科會試，都改在河南貢院（開封）舉行。科舉改制後的鄉試、會試的第二場為「各國政治藝學策」，每場考試由考官出五道「問策」，然後考生作答。兩科會試共10道「問策」，兩科鄉試各省合共170道「問策」。最後一次科舉考試的第二場，其「各國政治藝學策」，是這樣五道「問策」：

1. 學堂之設，其旨有三，所以陶鑄國民造就人才，振興實業。國民不能自立，必立學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愛之心，自養之技能，必需之知識，蓋東西各國所同，日本則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鑄國民之教育也。講求政治、法律、理財、外交諸專門，以備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設農、工、商、礦諸學，以期富國利民，

<sup>113</sup> 雷瑄編，《中外策問大觀》，卷28，頁6-7。

此振興實業之教育也。三者孰為最急策。

2. 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實，蓋縷舉近百年來歷史以證明其事策。
3. 日本變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國以日強，埃及用外國人至千餘員，遂至失財政裁判之權而國以不振。試詳言其得失利弊策。
4. 《周禮》言農政最詳，諸子有農家之學。近時各國研究農務，多以人事轉移氣候，其要曰土地，曰資本，曰勞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實資智識。方今修明學制，列為專科，冀存要術之遺。試陳教農之策。
5. 美國禁止華工，久成苛例，今屆十年期滿，亟宜援引公法，駁正原約，以期保護僑民策。<sup>114</sup>

不難看出，無論「問策」所涉及的範圍還是對士子的引導，正式考試之「策問」與本文所重點討論的《中外策問大觀》所列「策問」是頗為相似的。因此無論是否為正式考課的題目，都值得作為晚清思想發展的重要資源加以檢討。而梳理為應對這一變革所出版的供應試士子「揣摩」的策問資料，可以瞭解晚清科舉改革何以會選擇「策論」替代「八股文」，更可知悉這些「策問」資料如何反映世風之丕變與思想學術的轉型。尤其重要的是，就這些「策問」資料的形成來說，既包含著上層政府官員所出「問」，還呈現了千千萬萬的士子是如何應答這些問題的。

在近些年的思想史研究中，研究者不乏這樣的主張，菁英和經典的思想與普通的社會和生活之間，還有一個「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的世界」，而這個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的延續，也構成一個思想的歷史過程，因此它也應當在思想史的視野中。<sup>115</sup>問題的關鍵在於何謂「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就上述

<sup>114</sup> 顧廷龍主編，《清代硃卷集成》，冊 90，光緒甲辰(1904)恩科，頁 57-485。

<sup>115</sup> 葛兆光，《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中國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葛兆光，《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中國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

策問資料來說，也許很難歸到其中，但對於呈現晚清「思想資源」的版圖來說，卻是新的途徑。因為其考試內容「各國政治藝學」，呈現了上層官員及一般士子對於中國所處境遇和世界事務的看法，尤其還包含了對於思考中國問題的具體策略。關鍵還在於，「策問」的特殊體裁形式，具有明顯的導向作用，由「問策」的具體題目引導眾多士子關心這些問題。透過這些「策問」，一方面我們可以瞭解晚清上層官員所憂心的樞機所在，另一方面清末參加科考的數十萬士子在「問策」的導向下所作應策，也呈現出知識階層一般的思想狀況。毋庸諱言，作為官方的考試，無論是問策者還是應策者，都不免恪守於官方意識形態。彙編而成的「策問」更是具有「揣摩」性質，但即便如此，其所體現的清末士子的思想狀況，仍值得加以重視。用不著特別指明，「策問」不僅數量驚人，內中所包含的信息也極為豐富，要檢討其中所呈現的「西學」知識，尤其是士子援據哪些「思想資源」以應策，或者需要針對具體的文本才能更好展開。進一步的探討，只有俟諸另文了。

## 徵引書目

### 一、史料

- 《中外日報》，1902-1903。
- 《申報》，1898、1903。
- 《知新報》，上、下冊。澳門基金會、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
- 《時務報》，冊7、8，1896年10月7、17日。
- 《萬國公報》，1881-1882、1891、1893。
- 《聖祖仁皇帝實錄》，卷9。見《清實錄》，冊4。北京：中華書局，1986。
- 《德宗景皇帝實錄》，卷419。見《清實錄》，冊57。北京：中華書局，1986。
- 上海市松江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著，《松江縣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 上海廣學會編，《新學彙編》。上海：廣學會，1898。
- 中國史學會編，《戊戌變法》，冊2。上海：神州國光社，1953。
- 王 韜，《格致書院課藝》。上海：上海圖書集成印書局印，光緒二十四年(1898)。
- 王西清、盧梯青編，《西學大成》。上海：醉六堂書坊，1895。
- 甘韓編，《清朝經世文新編續集》，卷21。台北：文海出版社，無出版日期。
- 仲英輯，《分類洋務經濟策論(增洋務十三編新政策)》。介記書局，1901年石印。
- 朱大文輯，《萬國政治叢考》。上海：鴻文書局石印，光緒壬寅年(1902)。
- 吳頌炎，《策學備纂》。上海：點石齋印，光緒十四年(1888)。
- 李天綱編校，《萬國公報文選》。香港：三聯書店，1998。
- 周振甫註，《文心雕龍注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 法式善等撰，《清秘述聞三種》，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2。
- 徐維則輯，顧燮光補，《增版東西學書錄》。1902。
- 晏海瀾、袁清舫編，《西學三通》，萃新書館精本。上海：文盛堂石印，1902。
- 秦榮光輯，《中西經濟策論通考》。深柳讀書堂印，光緒壬寅(1902)。
- 張之洞，《勸學篇》，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9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 張建孫編，《西學二十種萃精》。上海：鴻文書局石印，光緒二十三年(1897)。
-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收入氏著，《飲冰室合集》，專集冊1。上海：中華書局，1936。
-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影印本。
- 盛康編，《皇朝經世文續編》，「禮政六貢舉」，卷66。思刊樓刊板，光緒二十三年(1897)。
- 陳忠倚輯，《皇朝經世文三編》，卷十二學術十二，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76輯，冊1。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
- 麥仲華輯，《皇朝經世文新編》。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
- 湯 震，《危言》，卷1。光緒十六年石印本(1890)。

- 賀長麟輯，《皇朝經世文編》，冊1。台北：文海出版公司影印本，無出版年月。
- 葛士濬輯，《皇朝經世文續編》。廣百宋齋校印本，光緒十七年(1891)。
- 葛士濬輯，《皇朝經世文續編》。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 雷瑄編，《中外策問大觀》。硯耕山莊石印，1903。
- 雷瑄編，《古今史論大觀》，前編15卷，後編17卷。硯耕山莊石印，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
- 劉昌齡輯，《策府統宗》。上海：蜚英館三次印，光緒辛卯季春(1891)。
- 儲桂山輯，《皇朝經世文續新編》。義記書局石印本，光緒二十八年(1902)。
- 謝甘盤評選，丁燮坤編訂，《策論學偶》。板藏舊學山房，光緒戊戌新鐫(1898)。
- 鴻寶齋主人編，《中外政治策論彙編》。上海：鴻寶書局石印，光緒辛丑(1901)。
- 譯書會主人編，《中外政藝策府統宗》。上海：中西譯書會印，光緒辛丑仲冬(1901/1902)。
- 聽秋舊廬主人，《中外經世策論合纂》。上海：鴻雪齋仿泰西法石印，光緒壬寅(1902)。

## 二、專書

- 日本近代中國研究委員會編，《清朝經世文編總目錄》，冊1。台北：文海出版公司影印出版，無出版年月。
- 王忭主編，《嚴復集》，冊1、3。北京：中華書局，1986。
- 王德昭，《清代科學制度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4。
- 王韜著，李天綱編校，《弢園文新編》。香港：三聯書店，1998。
- 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 朱有瓚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1輯，下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
- 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四)。北京：中華書局，1958。
- 朱維錚編校，《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
- 何懷宏，《選舉社會及其終結——秦漢至晚清歷史的一種社會學闡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
- 吳承學，《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
- 周振鶴編，《晚清營業書目》。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
- 姜義華、吳根樑編校，《康有為全集》，第2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姚公鶴，《上海閒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
- 夏曉虹輯，《〈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 商衍鑾，《清代科學考試述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8。
- 張春帆，《九尾龜》。武漢：荆楚書社，1989。
- 張靜廬輯註，《中國出版史料補編》。上海：上海書店，2003。
- 張靜廬輯註，《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第3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
- 張顥著，崔志海、葛夫平譯，《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

- 陳谷嘉、鄧洪波主編，《中國書院史資料》，中冊。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 陳居淵編，朱維錚校，《書目答問二種》。香港：三聯書店，1998。
- 傅樂成編，《傅斯年全集》，冊4。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
- 彭明輝，《晚清之經世史學》。台北：麥田出版社，2002。
- 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
- 馮天瑜、黃長義，《晚清經世實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
- 葛兆光，《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中國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
- 葛兆光，《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中國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
-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 劉大鵬遺著，喬志強標註，《退想齋日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 錢穆，《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
- 顧廷龍主編，《清代硃卷集成》。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
- 顧燮光，《譯書經眼錄》，收入王韜、顧燮光等編，《近代譯書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
- Elman, Benjamin A.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 Franke, Wolfgang. *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 Harrison, Henrietta. *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 One Man'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1857-194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三、論文

- 〈朱峙三日記（連載之一）〉，收入中南地區辛亥革命史研究會、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編，《辛亥革命史叢刊》，第10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 〈朱峙三日記（連載之二）〉，收入中南地區辛亥革命史研究會、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編，《辛亥革命史叢刊》，第11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 王汎森，〈戊戌前後思想資源的變化：以日本因素為例〉，《二十一世紀》，總第45輯，1998，頁47-54。
- 王爾敏，〈商戰觀念與重商思想〉，收入氏著，《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198-322。
- 皮錫瑞，〈師伏堂日記(1897-1900)〉，《湖南歷史資料》，1958年第4期，頁65-126；1959年第2期，頁116-158。
- 陳獨秀，〈實庵自傳〉，收入林茂生等編，《陳獨秀文章選編》，下冊。北京：三聯書店，1984。
- 章清，〈「采西學」：學科次第之論辯及其意義——略論晚清對「西學門徑」的探討〉，《歷史

研究》2007年第3期，頁107-128。

章清，〈中西歷史之「會通」與中國史學的轉向〉，《歷史研究》，2005年第2期，頁75-95。

黃克武，〈經世文編與中國近代經世思想研究〉，《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2，1986年9月，頁83-96。

劉廣京，〈魏源之哲學與經世思想〉，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羅志田，〈科學制的廢除與四民社會的解體——一個內地鄉紳眼中的近代社會變遷〉、〈清季民初經學的邊緣化與史學的走向中心〉，收入氏著，《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羅志田，〈清季科學制改革的社會影響〉，《中國社會科學》，1998年第4期，頁185-196。

關曉紅，〈科學停廢與近代鄉村士子——以劉大鵬、朱峙三日記為視角的比較考察〉，《歷史研究》，2005年第2期，頁84-99。

關曉紅，〈科學停廢與清末政情〉，《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3期，頁194-204。

## Policy Questions (*Cewen*) and the Recep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A Study Based on the *Full Collection of Domestic and Overseas Policy Questions*

Zhang Qing<sup>\*</sup>

### Abstrac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addition of policy questions (*cewen*) in the reform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n the late Qing lay in their relationship to the recep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Policy questions reflected both social chang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holarship. The reformed examinations required the “Five Questions on Politics and Industry of Various Countries” for both provincial and national exams. *Wence* (policy questions) on politics and industry of various countries provides a key to understanding how officials at all levels during the late Qing perceived the world, and *yingce* (the answers) written by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andidates who took the examinations reflected the general intellectual perspectives of the da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cep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in the examinations, based on *Zhongwai Cewen Daguan* (*Full Collection of Domestic and Overseas Policy Questions*) and other materials. It is clear that the adoption of policy questions in the exams paved the way for Western Learning and also helped to destroy the traditional knowledge structure of China. Reforming the examination system to rectify its problems was nothing new. The substitution of *bagu* (eight-legged essay) with *celun*, however,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academic studies. In other words, materials about *cewen* are not only representation of the Western Learning of the late Qing, but also contributed

---

\* History Department of Fudan University

to the spread and “reproduction” of knowledge. Studying *cewen*'s relationship to the reform of the examination system and its role as a medium of Western Learning contributes to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special position of *cewen* in the late Qing.

**Keywords:** *cewen* (policy questions), imperial examinations, Western Learning, *Zhongwai cewen daguan* (Full collection of domestic and overseas policy questions), *Jingshi wenbian* (Writings on statecraft)